



東方考古研究通訊

二零零四年六月
第2期



山東大學東方考古研究中心
Oriental Archaeology Research Center of Shandong University

《东方考古研究通讯》编辑委员会

白云翔 陈星灿 方 辉 宫本一夫 栾丰实
佟佩华 王 青 文德安 赵 辉

主 编：方 辉

封面设计：韩小囡

本期编辑：陈淑卿 王 芬 卢建英

主办单位：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

地址：济南市山大南路 27 号

邮编：250100

E-mail: arc@sdu.edu.cn

网址: www.arc.sdu.edu.cn

电话: 0531-8366149/8565268

传真: 0531-8565268

目 录

第四纪末次冰期气候与环境变化对人类文化发展的影响·····	容达贤、史红蔚 (1)
中国古代社会发展阶段论纲·····	白云翔 (2)
中国文明起源纵横谈·····	于海广 (3)
远古民族与中华文明进程论纲·····	王永波 (5)
玉器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中的作用·····	孔德安 (7)
“神性”和“人性”在早期文明进程中的历史作用·····	崔大庸 (8)
天坛与地坛·····	车广锦 (9)
太行与泰沂之间——古黄河下游两岸的史前文化·····	段洪振 (10)
中原文明的传播与上古东南社会的发展·····	吴春明 (11)
论海岱地区的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	张国硕 (12)
海岱地区的文明化进程·····	何德亮 (13)
海岱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的历史回顾·····	燕生东 (14)
试论鲁东南地区的古代文明化进程·····	刘延常 (15)
大汶口文化的南渐与文明的进程·····	杨立新 (16)
尉迟寺聚落对研究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重大贡献·····	王吉怀 (17)
试析景阳岗龙山文化城址——也谈海岱对中原文明的影响·····	王守功 (18)
从齐鲁之别谈起——海岱地区文明演化的多元视角·····	吴卫红 (20)
动态环境中的聚落系统：中国安阳的区域性考古调查·····	荆志淳 (21)
蒙城尉迟寺大汶口文化聚落与社会·····	魏 峻 (22)
胶东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地理分布及相关认识·····	王富强 (23)
试论尚庄三期文化·····	王恩田 (24)
东亚玦饰的起源与扩散·····	邓 聪 (25)
在史前社会中应努力发挥历史文献的作用·····	马良民 (26)
东方与文明研究举隅——关于古汉字起源于宗教的假说·····	孙敬明 (28)
试析二里头文化晚期陶器中的外来因素·····	朱君孝 (29)
商源东方的精神文明线索·····	程一凡 (30)
郑州商城外郭的发现和研究·····	袁广阔 (31)
洹北商城一号宫殿基址初步研究·····	杜金鹏 (33)
属于十二台营子阶段的三个东北地区铜剑文化间的交流关系和样态·····	吴江原 (34)
枣庄东江春秋墓地发掘的意义及相关问题·····	李光雨 (35)

齐长城源头建置考·····	任相宏 (36)
中原、南方所见匈奴文化的影响·····	乔 梁 (38)
海岱地区出土的砚台·····	吉田惠二 (39)
韩国的风纳土城及百济王京遗迹发现和中国古代城郭·····	李亨求 (40)

调查与发掘简讯

2003 年小清河上游南部区域系统调查新收获·····	钱益汇 (41)
山东济南市腊山汉墓发掘简报·····	济南市考古研究所 (43)
长清大觉寺东汉砖室墓发掘情况·····	济南市考古研究所 (45)
济南县西巷考古发掘·····	济南市考古研究所 (47)

中心工作进展

东方考古研究中心植物考古实验室介绍·····	靳桂云 (49)
------------------------	----------

Contents

The influence of climate and environment change on cultures in last glacial of Quaternary	Rong Daxian , Shi Hongwei (1)
On the Developmental Stage of Ancient Chinese Society.....	Bai Yyunxiang (2)
Extensive discussion on the origi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Yu Haiguang (3)
A brief research on prehistoric nationalities and the proces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Wang Yongbo (5)
The role of jade in the origin of ancient Chinese civilization.....	Kong De'an (7)
The historic role of “deity” and “humanity” in the early civilization process.....	Cui Dayong (8)
The heaven altar and the land altar	Che Guangjin (9)
The prehistoric cultures in the region between Taihang and Taiyi Mountains--- the middle and lower valley the Yellow River.....	Duan Hongzhen (10)
The relation of the confusion of the Central Plain civil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rehistoric society in southeast China	Wu Chunming (11)
Research on the process of ancient society and civilization in Haidai region	Zhang Guoshuo (12)
The civilization process of the Haidai region.....	He Deliang (13)
Retrospect of the study on civilization process in Haidai region.....	Yan Shengdong (14)
On the ancient civilization process in southeast of Shandong Province.....	Liu Yanchang (15)
The south-extension and the process of civilization of Dawenkou culture.....	Yang Lixin (16)
New achievements of the Dawenkou period settlement site of Yuchisi	Wang Jihuai (17)
On the Jingyanggang walled-town of the Longshan Culture — also the influence of the Haidai civilization on the Central plains region.....	Wang Shougong (18)
Begin with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Qi and Lu cultures — Poly- perspectives of civilization evolution in Haidai region.....	Wu Weihong (20)
Settlement systems within a dynamic environment: regional archaeological survey in Anyang, China	Jing Zhichun (21)
Settlement and society at the Dawenkou period site of Yuchisi in Mengcheng County	Wei Jun (22)
The distribution and related issues on the Neolithic sites of eastern Shandong province.....	Wang Fuqiang (23)
Probe on the Shangzhuang III culture	Wang Entian (24)
The origination and spread of slit rings in the East Asia	Tang Chung (25)
Role of Historical Documents in the Studies on Prehistory Society.....	Ma liangmin (26)
A view on the orient and civilization research—The hypothesis of ancient Chinese characters originated from religion	Sun Jingming (28)
The foreign pottery factors in the late period of the Erlitou culture	Zhu Junxiao (29)
A Circum-Pacific coastal highway of ancient culture	I-fan Cheng (30)

Discovery and research on the outer wall of the Zhengzhou city-site, Shang Dynasty.....	Yuan Guangkuo(31)
Discovery and research on the Palace I of the Shang Dynasty city-site at Huanbei, Anyang.....	Du Jinpeng (33)
Relation and state of the interchange among the three bronze –sword culture in Ershitaiyingzi Phase of northeast China	Wu Jiangyuan (34)
The significance and related problems of the Spring-Autumn Period cemetery Dongjiang, Zaozhuang City, Shandong Province	Li Guangyu (35)
Research on the origin and organization of Qi – state stonewall, Late Zhou Dynasty.....	Ren Xianghong (36)
Influence of Xiongnu culture on Central Plains and southern regions	Qiao Liang (38)
The ink slabs unearthed from Haidai region.....	吉田惠二 (39)
The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of Fengna (凤纳) Wall-town and Paekche(百济)	
Capital-city in S.Korea and Their Relations to Ancient Chinese City Wall.....	李亨求 (40)
The new Achievment of the system survey in south area of Xiaoqinghe, 2003.....	Qian yihui(41)
Excavation of Lashan Han tomb at Jinan city.....	Jinan Municipal ICRA (43)
Excavation of brick-chambered tomb of the Eastern Han Period at Dajuesi in Changqing country.....	Jinan Municipal ICRA (45)
Excavation of Xianxixiang site, Jinan City.....	Jinan Municipal ICRA (47)
The brief introduction of the botany-archaeology laboratory in the The Research center of Oriental Archaeology	Jin guiyun(49)

第四纪末次冰期气候与环境变化对人类文化发展的影响

——兼论中国史前洪水成因与古史传说时代

容达贤 史红蔚

(深圳市博物馆)

人类生活离不开自然环境，生产活动要利用自然条件与资源。自然环境中气候、地面植被、地形、河流和海洋等环境的变迁，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影响十分显著。本文通过第四纪末次冰期气候变化对人类生存环境造成的影响，探讨我国古史传说时代大洪水的成因以及农业的起源，并初步推定夏代之前古史传说时代之年代。

关于古史传说时代的研究以往做过不少，有的学者还结合考古发掘收获对古史传说时代的相关民族及活动地域进行了研究，但是，关于古史传说时代的年代始终没有得出较为符合客观事实的结论。历时5年，于2001年完成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推断夏代始年约为公元前2070年，探索夏代以前的历史年代的“古代文明探源工程”也即将启动，相信将会真正触及关于古史传说时代年代推定的问题。笔者认为，古代文明探源中关于古史传说时代年代的推断，需要进行多学科综合研究，才能得出较为符合客观事实的结论。笔者认为，夏禹以前的“三皇”、“五帝”虽然属于传说时代，但其年代并非完全不可考，通过对古史传说中史前大洪水的性质及其发生和结束时间的研究和考察，经科学论证，大致的年代框架是可以推定的。

探索分布于黄河、长江流域地区古史传说时代农业经济文化的来源，包括夏禹的来源，是我国即将启动的“古代文明探源工程”的一项重要内容。笔者认为，在第四纪末次冰期与冰后期气候的影响下，自然环境所发生的剧变对人类文化发展所产生的作用（主要指农业的发明）不可忽视，因此，关于古史传说时代诸问题的研究，都不应与之脱离。

第四纪末次冰期气候的结束，使气候变暖、陆地冰川消融，原来冰缘地带的草原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喜冷动物群失去了以往赖以生存的草原，它们随着冰川的退缩而往北迁移，在食物渐缺的同时又被北上的猎人追击，很快就走向了灭绝。而习惯以肉食为主的新智人不得不转向渔猎与采集并重的经济生活，冰后期冰川融水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形成了许多湖泊，江河入海处也形成了水网密布的三角洲平原，由于气候温暖，水量充足，促使各种植物大量生长，为冰后期新智人处于转型适应阶段的渔猎，采集经济生活提供了良好条件。从距今1万年前冰后期华东地区温暖湿热的气候特征看，当地农业起源之初的栽培作物应该是水稻。推测最早的稻作农业文化发源地位于东海浅海大陆架，确切地点是在位于陆架上的古长江三角洲。

综合以上几方面的情况分析，关于古史传说时代年代推断的结论为：当第四纪末次冰期气候结束的“冰后期”之时，距今约1.5~1.2万年前，是以营狩猎经济为主的少昊及伏羲氏时期；距今1.1万年~约4千年前，是以营农业经济为主的“五帝”：黄帝、颛顼、誉、尧、舜以及后来的鲧、禹、契、稷时期。

中国古代社会发展阶段论纲

白云翔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由原始到发达的极其漫长而曲折的历史过程，而这个过程是由若干不同的发展阶段前后相继构成的。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这里从社会组织结构的演进出发概括为：“三大变革”与“四个时代”。

三大变革，是指中国古代社会发展进程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三次历史性大变革，即距今大约 1 万年前的氏族公社革命、公元前 21 世纪前后的王国革命、公元前 221 年的帝国革命。

由于三次大变革的依次发生，把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划分成四个时代，即人类诞生至 1 万年前的原始群与血缘公社时代、大约 1 万年前至公元前 21 世纪夏王朝建立的氏族公社时代、夏王朝建立至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统一中国的王国时代、秦王朝建立至 1911 年清王朝灭亡的帝国时代。

另外，在三次社会大变革前夕由旧时代向新时代的过渡阶段，出现了三个社会转型期，即大约 5 万年前至 1 万年间的第一次转型期、公元前 25 世纪至公元前 21 世纪的第二次转型期、公元前 770 年至公元前 221 年的第三次转型期。

根据社会组织形态的演进划分中国古代社会发展阶段，不仅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而且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我们这里根据社会组织结构的发展演变，就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提出了原始群与血缘公社时代—氏族公社时代—王国时代—帝国时代的划分。如果划分可以成立，那么，有三个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和研究：一是关于古代社会的发展进程，不仅可以根据其技术和物质文化、社会经济形态进行考察，而且可以从社会组织结构方面进行考察，或许后者不能为前两者所代替；二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阶段的划分，既要考虑到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借鉴外国的理论和方法，更要从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发展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建立我们自己的理论体系；三是根据古代社会的发展进程，如何理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以及它们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各自的作用和地位问题。或可认为：在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从总体上说，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最活跃、最根本的动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组织结构的演进并不同步，两者之间不是简单的、绝对的对应关系，而是一种“区间”关系；一定的社会组织结构是以一定的社会生产力为基础的，但社会制度对社会生产力（尤其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刺激、保障、制约作用相当强大；社会组织结构的发展从根本上和整体上说不能超越一定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但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之下，又可以产生出与之相适应的不同的社会组织结构和社会制度；忽视社会生产力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根本性作用是错误的，但低估社会组织结构自身的演变规律及其作用同样是错误的；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发展道路的正确与否，往往决定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前途和命运。

中国文明起源纵横谈

于海广
(山东大学考古学系)

中国古代文明是世界古代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研究不仅受到中国学者的普遍关注，同样也有许多外国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参与这一课题的研究。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是长期以来一个热门话题，在中国是继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的又一个重大攻关项目，被称为探源工程。

在这项研究中，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探索，既有从理论方面的研究，也有对具体资料的分析；既有对文献资料的解读，也有针对性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实践，以丰富这方面的资料；既有以传统方法对“文明要素”的讨论，也有吸收新的科技手段方法的分析。在这些研究中，除集中对中国的资料专门研究外，也有不少人用中外资料进行对比研究。我们认为在文明起源研究中，文献史料固然有重要的、不可缺少的作用，但首先是以考古手段取得的实物资料为基础，这是我们借以了解、认识和研究古代社会最直观、最丰富的资料来源，是各种研究的起点。

(一)

关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主要指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文明因素的发展过程，另一个是文明形成的表现和特点，这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在这方面的研究中，学者们比较一致的认识那就是文明进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是这其中有的认识也是需要讨论的，例如有的学者在结合某一区域文明进程讨论中，提出以某一个考古学文化为启动，划分出几个文明进程的阶段，而且这种认识也带有一定的普遍性。我们认为把文明进程人为划出几个规范的阶段是不妥当的，特别是文明因素是广泛的，不同区域出现的时间会有很大的不同，而且涉及到古代人生活、生产的文化现象丰富多样，哪些是文明因素也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例如我们认为火的使用在人类发展、在文明起源发展中有重要的作用，而人类用火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我们能说远古人们开始用火不是文明进程中的“启动”之火，不是文明因素的接力之火吗？又如考古出土的乐器最早距今 7000—8000 年，如舞阳贾湖的七孔骨笛，它在古代乐器史、古代音乐史以至商周礼乐的研究中的意义是大家公认的，它是今天我们听不到的古乐代言物，我们说正是在这种古笛的回荡中发展到文明社会的礼乐器和古乐，这中间的发展关系是不能割断的。再如在湖南澧县八十垱遗址发现有围沟，即我们所说的环壕遗址，这与在仰韶、大汶口诸文化中发现的围沟，与龙山时代的环境、城墙虽然有发展关系，如果说它们之间的使用性质尚可进一步讨论的话，作为古代的文化现象之间是没有截然不同的“壕沟”可以划分开的。类似的实例很多，所以我们认为苏秉琦先生讲的“文明起步超过万年”的认识、严文明先生提出的“文明进程是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的认识是正确的。至于某种文化现象什么时候出现、与文明进程有何联系，则要具体分析。

(二)

中国文明起源的总体趋势如何？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这也是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内容。中原文化中心说在我们的传统认识中占统治地位，即在中国地域内，中原文化最先进，最早进入文明社会，其他地区是在中原文化带动和影响下陆续步入文明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苏秉琦先生提出的“满天星斗”说，是对传统认识的挑战和冲击，在日益丰富的考古资料面前，这一认识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红山文明、良渚文明、石峡文明、大汶口—龙山文明或与中原文明同步，或更早于中原文明。红山文化在距今五千年率先跨入古国阶段，已达到基于氏族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级组织形式，这一现象“比中原地区看得清楚，而且先行一步”。良渚文化中的中心聚落，大型祭坛和以礼玉为主要随葬品大型墓葬的发现，都反映出它是中国最早进入文明的地区之一。各地文明火花此起彼伏，争相斗艳，各有特点，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认识中原文化和中原文明，事实证明，直到二里头文化期，中原文明一马当前的地位才真正显示出来，而且自此之后长期保持着领先地位。这里面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的，其中社会分工发挥着重要作用，既有生产领域的生产者和管理者的分化，也有原始宗教观念促成的阶级分化，是不同区域走向文明的不同道路。

（三）

在文明起源的研究中，学者们为阐述自己的学术观点，经常会使用一些名词、概念，有沿用过去的，也有新提出的。其中部分名词、概念在不同的文章中，其意义和内容不完全相同，给读者的理解带来一定困难或误解，我们认为在使用时应规范和严格。

很多学者将早期文明用“史前文明”来表述，从我们理解“史前”和“文明”是有关系而又不同的两个概念，有特定的内涵。在史学界，史前时期和历史时期相对应，野蛮时代与文明时代相对应。史前时期和历史时期是以有无文字为分界，在《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中指出，史前考古学是以“文字记载以前时代的考古资料为研究对象，与以文献记载时代为研究对象的考古学相对应”，这一说明以为有文字记载以前为史前期，研究这个时期的考古学为史前考古学；同理，研究有文献记载的历史时期的考古学则可称为历史考古学，野蛮时代是历史学上的原始社会后期阶段，文明时代是社会进入国家形态的阶段。在文明起源研究中，文字虽然是研究者关注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诸文明要素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它又不是社会进入文明的绝对因素，这在中外资料中都有实例，在考古学上认为已步入早期文明的考古学文化，如果用有无“文字记载”、“文献记载”来衡量，就会发现“文明”和“历史”阶段有一个时间差，即有的已步入文明同时有文字的存在，有的已步入文明但尚没有文字的存在（发现），它们都属于文明时代，但不一定是传统意义上的历史时期，至少从目前的资料所见应该是这样。“史前文明”是专指发现“文字记载”而已进入文明的考古学文化。我们认为，有无文字记载的早期文明社会，是文明起源的不同形式（或形态）。以此来分析龙山时代属于早期文明的考古学文化，就会发现统称为“史前文明”是不妥当的。所以说中国文明起源从有无文字记载来说，至少有两种形式，那么在这个前提下说“史前文明”就会更具体了。

远古民族与中华文明进程论纲

王永波
(山东省文化厅文物处)

一、远古时期的中国

“中国”一词最早见于《尚书·梓材》，最初只是一种地域概念，有“居天下之中”和“中央之族（国）”的含义。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概念经历了一个从小到大、从地域到民族、从民族到国家的历史演变过程，大致有五层含意。远古“中国”属于比较纯粹的地理概念，其范围大致与《禹贡》“九州”相当。

（一）远古“中国”及早期文明的生态属性

在早期典籍中，“九州”、“神州”是与“中国”大致相当的地理概念，“九州”最早见于《尚书·禹贡》，其他典籍中也有九州的记载，远古时期的九州，大致与今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及周边的河谷盆地相重合，而远古时期几个最为重要的中华文明发祥地恰恰也全部根植于这片绿色的大地。是“中国”远古民族的赖以形成、中华远古文化、早期文明赖以发展、演进的中心舞台。中华早期文明应属于平原“绿色”文明。

（二）初民的积聚与远古部族的形成

公元前1万年左右，人类历史步入了全新世——新石器时代，开始了定居农耕经济的新纪元。到新石器时代早期偏晚阶段，各地区发现的考古学文化，面貌清楚，内涵丰富，呈现出较为清晰的谱系传统。这些不同的考古学文化的分布区域在很大程度上与上古“九州”相重合。

1、黄河上中游的河原民族；2、黄河中游、淮河上游的洛颍民族（文化区）；3、海河上游的桑卫民族（文化区）；4、黄河下游的海岱民族（文化区）；5、长江、淮河下游的江淮民族（文化区）；6、长江中游的江汉民族（文化区）；7、辽河上游的辽源民族（文化区）。

各民族文化区大都经过了大约4000余年的持续发展，其物质文化面貌、风俗习惯、价值观念基本上是一脉相承的，具备了作为一个独立民族的全部要件，是远古三大部族集团和中华民族当之无愧的基始民族单位。

二、远古民族互动与三大族团的文化基础

田野考古资料的大量积累、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研究的深入，为中华古族的起源与形成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基础，“三大集团说”的时代局限性也因此而日益显露。因此有必要在现有考古学资料的基础上，就三大族团的族源构成及其与中华文明的相互关系做出更为合理的阐释。

（一）海岱、江淮、桑卫民族与东夷族团

（二）东夷、江汉民族与苗蛮族团

（三）相关各族在中原互动与河洛民族

（四）夏王朝的建立与华夏族团的诞生

三、中华古代文明的四个发展阶段

- (一) 族团内部的古国文明
- (二) 龙山时代的邦国文明
- (三) 三代时期的王国文明
- (四) 秦汉时期的帝国文明

传统的观点认为，华夏民族在中华古族中首先形成，是以炎黄部族为核心，不断吸收周边的先进文化，融合东夷、三苗及其他各部族之一部而形成的。现代考古学显示，远古中国的七大主要民族，乃至偏远地区的其他民族，基本上是齐头并进、同时形成的。在远古三大部族集团中，最先形成的是东夷集团和苗蛮集团，东夷、苗蛮集团积极参与中原逐鹿，其各自进入中原的一部，与洛颍、河原民族及周边其他民族一道，经过上千年的融合，形成了河洛民族。

作为中华民族主干、汉民族前身的华夏民族，是随着夏王朝的建立和存续而形成的，并在商周时期的民族大融合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和壮大。早期阶段的华夏民族，是在河洛族团基础上，进一步融汇东夷族团的大部、苗民集团的一部，兼而吸收周边其他民族文化而形成的。商周时期，随着宗主王国最高统治者的族属变换，周边的其他民族，如西戎、北狄在更大程度上参与了这一融合过程，到春秋战国时期，东夷集团的全部、苗蛮集团的大部已完全融入华夏民族，此后，夷、蛮、戎、狄中的东夷、苗蛮，是由河洛、东夷集团之全部、苗蛮集团之大部所构成的华夏民族，对更为偏远的周边民族的一种蔑称，在相当多的场合中，则是作为一种地域的概念而出现的，用于泛指“上古中国”以外的地区和人民。可见，三代以后的东夷和苗蛮，已丧失了原来意义上的、亦即远古部族集团的全部或大部分内涵。

远古三大部族集团和华夏民族的族源构成，进一步显示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历史特征。远古七大主要民族中的海岱、江淮、桑卫、洛颍四民族，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早在距今 7000 多年以前就建立起极为密切的文化交往；苗蛮族团于东夷族团的渊源关系和文化交流在距今 5000 年以前已经显现；河原民族、辽源民族分别在大致相同的时间内与洛颍、桑卫民族发生了直接的交往，与东夷、苗蛮集团也有着直接和间接的往来。另一方面，七大远古民族在进行“远古中国”内部交流的同时，与周边其他民族，如大西北地区的马家窑、齐家文化与河原民族；岭南、巴蜀地区的原始文化与苗蛮集团等等，也都发生过长期的交流、融合，周边各民族都有融入华夏民族的部分。华夏民族也有部分外迁而融入周边民族，由此构成了远古中国各民族错综复杂的文化、族源关系。

古史传说中混乱的世系、错综复杂的族源构成，恐怕很难全部视为传统史观系统化整理的结果。除千古一系世系之外，大部分应是远古各部族相互交流、融合而形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远古民族格局长期衍化的结果。

试论玉器在中国古代文明形成中的作用

孔德安

(山西大学)

目前,学术界探索和研究“文明起源”问题,一般是以文字、青铜器、城市作为“文明社会”的标尺,同时也考虑农业、手工业、礼器、祭坛、王陵等因素。可是对在文明形成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玉器却重视不够。笔者拟在以往一些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对玉器在文明起源中的作用进行新的探索。

一、玉器的礼制功能

礼是古代王朝的政治、宗教、刑法和朝章国典,是王朝统治者治理国家、维系家天下的等级制社会秩序的准则、制度。礼器是礼制用品,文明社会中必然有“礼器”。在文明形成过程中,玉器中的钺、琮、璧、璜等是重要的礼器。如良渚文化的玉钺为军事统帅的权杖,玉琮为贯通天地的礼器,玉璧为墓主人生前所拥有的财富的象征,玉三叉形器是良渚文化社会集行政、军事和宗教大权于一身的统治者顶戴的皇冠。这些用来表示贵族身份和社会地位的礼仪用器,在使用中有严格的规定,不同等级之间不得逾越。夏、商、周三代从良渚文化继承的古礼,既包括礼的文化精神、礼制的社会功能,也包括一些具体的礼器。

二、玉器的宗教功能

完备的文明制度与文化体系,包括政治、法律、宗教、伦理和社会制度等多重内容。宗教在文明起源过程中的作用具体说来主要有三点:一是促进了社会分层,形成专门的宗教、手工业、农业等人群;二是促进了居于社会上层的权贵阶层的形成;三是促进了管理公共事务机构的完善和发展。只有当社会内部分工、权贵阶层掌握的权力、公共事务机构的建构达到一定程度时,才可能产生国家的雏形,人类也将跨入文明时代的门槛。

三、玉器的技术功能

文明的生活方式应建立在相应的科学技术基础之上,玉器是生产技术发展的产物,是人类科技进步的反映。良渚文化时期,人们不仅能准确地识别玉,还能锯开直径达 30 厘米的玉璧,还刻划出只有用放大镜才能看清楚、细仅 0.2 毫米的纹饰,这可能是采用“砣”的制玉技术。玉质硬度大,加工工艺复杂,属于当时“高技术”,因此制玉技术的发展,必然带动石器、制陶等技术的进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进而加快文明形成的过程。

“神性”和“人性”在早期文明进程中的历史作用

崔大庸

(济南市考古研究所)

按现行中国考古学界的通常看法，文明起源与国家起源应是一个概念，不可分割，本文将采纳这一原则。

若要从国家的职能角度来讲，有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不断演化、转变的过程。有些国家职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与环境产生并发挥作用的，有些国家的职能则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也就是说，国家机器的内容是在不断更新的，适应的留用或变革后继续使用，有些内容则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些反复或重演，有些内容则仅在历史上的某个时期发挥过短暂的作用。但不管怎样改变，国家的基本职能是不会变化的。今天我们研究国家的起源或原型，就要找出那些最基本的要素来，一定要考虑到最初的国家机器是最简单的，是那个历史背景的产物，要放到当时的环境中去认识，去发现，去确定，切忌人为地将它们复杂化。

汤因比把世界上已发现的文明国家分为 26 种类型，苏秉琦把中国的文明起源喻为“满天星斗”，由此可以看出文明与国家的个性化和复杂化。共同的也是最简单的，每一个个案应在共同要素的基础上，再加上自己的特点而变得较为复杂化。如有的学者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北方地区属礼仪文化背景，南方地区则属于巫覡文化背景，其基础不同，所发生出的文明现象也不同。

在讨论文明进程等问题的时候，汤因比认为每个文明都有一个发生、发展、衰退、解体的过程，但他后来认为中国的文明应该另当别论。其实从中国成熟后的大文明来说确实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但若上溯到中国早期的众多文明古国来讲，同样走过了从起源到发展，到衰落或被其他文明所征服的过程。

文明的衰落与发展壮大有一个普遍的现象，从世界或中国的早期文明来看，简单地说，凡是竭尽全力为“神”的文明，或盛极一时，或停止不前，进而迅速或逐渐衰败了，如玛雅文明，良渚文明。因为他们把人们所创造的财富不再用于社会发展和人民的生存上，而是一味地用于神，整个社会被神的气氛所笼罩，人们不思进取，把一切都寄托在了神的身上，这种现象是非常可怕的，也是不能永续发展壮大的。相反，凡是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类着想的文明社会都得到了不断的发展壮大。这样的社会不是没有“神”，但这种神能被人所操纵，从而把敬神的活动变成了理性的礼仪制度，变成了为人类服务的工具，变成了社会发展的助力器和润滑剂。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与发展的过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中国古代文献中关于早期国家的学说无不体现了以人为本的观念。照理说，像中国这样有深厚哲学文化基础的国家形成一个像世界“三大宗教”那样的宗教是完全有可能的，但历史的发展却表明中国最终没有形成这种影响超凡的宗教，说明中国的文明是人性化的，更是理性化的。

天坛与地坛

车广锦

(南京市考古研究所)

祭坛，是专门用以祭祀的人工堆筑的高台。中国早期的祭坛，最具代表性的是良渚文化的祭坛和红山文化的祭坛。北京清代皇家的天坛和地坛，则是中国晚期祭坛的代表。

1999年—2000年，南京市文物研究所在钟山主峰南面的一座山嘴上发现并发掘了大型南朝祭坛，并先后两次举办专题学术讨论会。发掘者认为这是一座南朝刘宋时期的北郊坛，性质是地坛，与祭地有关。但有人对这一建筑的性质提出质疑，其中一说认为在唐长安城南郊发现的天坛位于平地，南京的南朝地坛是不可能高山之上的。由是，发掘者从慎重起见，称之为“坛类建筑遗存”（《南京钟山南朝坛类建筑遗存一号坛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7期）。

传统观念认为，“天圆地方”，所以天坛为圆形，用于祭天，地坛为方形，用于祭地。由此衍生出地坛应该位于平地的想法。这里介绍古代两种观念：一是高山离天近，耸立的山峰被古人看成是通往天上的道路，神仙也往往通过灵山升降于天地；二是“天父地母”，“皇天后土”，古人将上天视为父亲，视为男性，将大地视为母亲，视为女性。所谓祭祀，就是祭神和祀祖。祭祀的目的是愉神，使神赐予福祉。古代礼神“必像其类”，与世俗送礼需投其所好如出一理。祭天祭地也是如此，天为父，为男，祭之则应礼以地母；地为母，为女，祭之则应礼以天父。天坛象征天，故以天坛祭地；地坛象征地，故以地坛祭天。如果说以天坛祭天，以地坛祭地，在世俗中就是自己给自己送礼，与理不合。应该是天坛用于祭地，以取悦地母；地坛用于祭天，以取悦天父。祭祀实际上就是给神送礼，也要考虑神灵享用上的方便。高山离天近，祭天则要登高以便天父享用，所以地坛需建在山上；祭地则要临地以便地母享用，所以天坛则要筑于平地。故南京南朝祭坛在钟山之巅，西安唐代天坛在平地之上。

现在上溯到良渚文化的瑶山祭坛和红山文化的东山嘴祭坛以及牛河梁祭祀遗迹。瑶山祭坛位于瑶山之上，平面呈方形，内外三重，最里面一重为红土台，第二重为灰色土，第三重为黄褐色土。显然，这是一座具有强烈象征意义的地坛。瑶山祭坛上的玉器大墓分为两列，一列基本为男性墓，一列基本为女性墓，而女性的一列墓较男性的一列更处于祭坛的中心位置，这也当有一定的涵义。红山文化东山嘴方形祭坛也位于山上，发掘还发现数件孕妇裸体塑像。红山文化牛河梁女神庙同样位于山上，在女神庙里已发现数件形体逼真的女性塑像。我曾推测这些女性塑像是古国时代公主的象征，而公主则是地母的化身。与女神庙同处于山顶的还有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很有可能就是祭坛，其情形与东山嘴祭祀遗迹较为相似。

无论是良渚文化的瑶山，还是红山文化的东山嘴、牛河梁，都将地坛筑于山上，并且都有女性塑像或墓葬。这更使我们相信，天坛筑于平地，用于祭地，地坛常建于山上，用于祭天。如果说曾经存在过以天坛祭天、以地坛祭地的观念的话，那也是封建社会后期的事。从新石器时代至隋唐时期的考古资料说明，天坛用于祭地，地坛用于祭天；天坛筑于平地，地坛往往建于山上。

太行与泰沂之间

——古黄河下游两岸的史前文化

段宏振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一、 史前时代的黄河下游地区——太行与泰沂之间

今天的黄河下游已摆移到泰沂山脉脚下，史前时代的黄河下游远较现在偏西北，流经今河北平原入渤海。因此，史前时代的黄河下游地区的概念是太行山脉与泰沂山脉之间的广袤平原，此乃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史前黄河下游决溢改道频繁，而且正流、干流之外，还有若干岔流、决流，故而太行与泰沂之间广阔平原的中心地带是浩瀚的黄河诸河道——正流、岔流、决流以及故道，因此形成了宽广的黄河河道迁移摆动地区，亦即太行与泰沂之间的中部冲积平原地带，这一带人烟稀少，史前文化遗迹很少。而在中部冲积平原的两侧，也就是太行与泰沂两条山脉的山前冲积平原地带，则分布有稠密的史前遗址，生存着繁荣的史前文化。

二、 黄河左岸太行山脉东麓的史前文化

史前文化发展序列：南庄头遗址——磁山文化、上坡类型——北福地文化——后冈一期文化——钓鱼台类型——大司空类型——台口一期——龙山时代文化。该地区自始至终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连续发展的文化区域，文化谱系发展不连贯，因时间而所属于不同的文化区系。而且，大部分时间与山脉背后的文化是两个系统。

三、 黄河右岸泰沂山脉北麓的史前文化

史前文化发展序列：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该地区自始至终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区域，文化发展轨迹基本一脉相承。同时，与山脉背后的文化一直属于同一文化系统。

四、 短暂的黄河下游史前文化区

尽管太行山东麓史前文化具有突出的复杂性，但其与隔河相望的泰沂北麓史前文化仍在某一时间具有一定的同步性与一致性，即史前的黄河下游曾经有过一个相对短暂的在某种层次上的统一文化区，也就是在约公元 5500—4000 年之间，北福地—后冈一期文化与北辛文化。两支系统的文化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均以釜、支脚、鼎、钵等为典型陶器群，应同属釜鼎文化系统。也可以说，此时的黄河下游同属于海岱文化区。

五、 史前黄河下游的重要性

太行与泰沂之间的古黄河下游平原，正处于中原、海岱、北方三大文化区域之间，是三大文化系统碰撞、交流、融合的前沿地带。太行山东麓地区更是一条文化交流的走廊，其交流方向不仅是南北向的，同时也是东西向的。这种文化的交流与互动，对夏商文明的诞生起着重要的作用。

中原文明的传播与上古东南社会的发展

吴春明

(厦门大学历史系)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结构的嬗变始终伴随着中国文明起源与发展的时空进程，多元的文化奠定了社会文明的多元起源，而以华夏、汉民族文化为核心的多元民族文化一体化趋势的发展又离不开文明中心的成长。上古文明社会的成长主要表现为文明核心地带的夏、商、周三代帝国的更迭，在以汉、唐王朝为代表的整个中世纪时期，中原地区作为中国古代文明核心地带的格局也始终没有动摇过。中原核心作为中华多元文明最先进的“上游”地带，在整个中古时期对周边地带社会文化发挥了强烈的辐射、带动作用，成为周邻民族社会文明成长的动力源泉。

在奠基于史前、确立于上古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多元文化的文明化进程与水平存在明显的空间落差，这种落差与多元文化距离中原文明核心地带的地理远近、与华夏和汉民族文化的融合关系程度密切相关。这种以中原为龙头、四邻地带递次落差的有序化的中华文明内在结构，不但形成了文明中心的华夏、汉民族文化向四邻扩展、辐射的动力，也树立了周邻民族在文明化的轨道上仰慕、模仿的标准，从而成为中华民族多元文化一体化过程的重要机制。在我国人文地理中，“东南”概念就是源于以中原华夏为中心的中华多元文化的一统思想。以华夏“中国”为中心的视野去观察“四方万国”，因而长江下游以南的扬州地称为“东南”，即所谓“东南曰扬州”。但随着华夏对四邻人文的关系、认识程度逐步由“中原”向外围推进，对东南民族、地理的认识也由北往南经历了一段较长时期的扩展过程。在社会文明的进程上，上古东南不但表现出发展水平的总体落后，还同时表现出由北往南的递次落差，这种地带性落差与土著社会接触中原华夏的先后即上古“东南”地理由北往南“扩展”的过程一致。

东南早期古文化的发展水平较中原华夏文化的整体滞后以及由北往南递次落差的格局，在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研究成果上有更为明确的证据，即以印纹陶遗存的“三个地带多区系而一体”的总谱系为代表的东南上古文化发展的差序格局。东南内侧的湖网平原地带是长江下游南岸、武夷山—南岭分水岭北侧，在整个东南土著文化体系中处于龙头位置，发展水平最高，良渚文化是中华文明起源的几个中心地区之一，青铜文化的产生、发展与黄河区基本同步，成为我国古代青铜文化的一个重要中心。东南沿海丘陵山地地带是指珠江、闽江、韩江、瓯江等诸河流域为中心的闽、粤、桂、琼及浙南，武夷—南岭是一道重要的自然与人文分水岭，将这一上古土著文化群系远隔在中原华夏文明视野之外，古文化发展进程整体滞后。直到中原王朝文明已经建立的夏商时代，这一地带还停留在新石器时代的发展水平，周代以来仍处于不发达的青铜文化阶段，社会文明的起源也星星点点，直到东周以后，才在楚、汉文明的推动下跨入文明社会的门槛。而海峡对岸的台湾及相连的岛夷地带，更处于东南地区的边缘，远在中原早期古文明影响力的辐射范围之外，土著社会文化的发展水平长期停滞，随着明清以后汉文化的大量移入，台湾历史文化发展的严重滞后局面才有所改变。

论海岱地区的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

张国硕

(郑州大学历史与考古系)

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形成与发展，有着自己独特的模式和进程。同时，由于中国地域辽阔，不同地区的文明程度和文明化进程也有一定的差异。

从世界范围来看，大体来讲，国家的出现、青铜冶铸技术的进步及金属生产工具的广泛应用、文字的产生等现象，寓示着文明的最终形成。就中国而言，判断古代社会何时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准是国家或“雏形国家”的出现。其物化表征应包括3项：一是具有较大区域性政治中心功能的城或城市的建立，二是社会形成等级差别和礼制的物证，三是青铜冶铸技术的出现及青铜器的较广泛使用。研究发现，龙山时代（距今5000-4000年）中国整体上已初步进入文明时代。

海岱地区的文明化进程大致经历了孕育、滥觞、形成、低落、交流与融合等5个时期。

大汶口文化中期（距今5500-5000年）为文明的孕育时期。这个时期发明地面式建筑。墓葬规模以及随葬品数量、规格差别增大，出现少量殉人墓葬。不见或少见具有较大范围政治中心功能的城或聚落。这个时期海岱文化开始向西对中原地区产生一定的影响。

大汶口文化晚期（距今5000-4600年）是文明的滥觞时期。大型聚落的出现和大范围聚落群的形成，表明当时已建立了雏形国家；已能建造一些夯土城；墓葬中贫富分化现象严重，大墓中用人殉葬现象常见，反映出当时存在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权贵阶层；独立手工业形成，并出现制造出专门的玉礼器；多处遗址发现了写在属于礼器大口尊上的图像文字。但由于这个时期专门的青铜冶铸业可能尚未出现，城的修筑尚不普遍，故整体上社会应处在文明社会门槛之处或刚刚步入文明社会。此阶段海岱文明进一步向西对中原和江淮地区产生较大影响。

山东龙山文化时期（距今4600-4000年）是文明的形成时期。这个阶段，城较普遍修筑，出现具有政治中心功能的大型中心聚落和聚落群，较为成熟的文字形成，能够制造精美的蛋壳陶器和玉器、铜器，等级埋葬制度和礼制形成。海岱文明较为先进，对周围地区产生广泛影响。

岳石文化时期是文明发展的低落时期。与龙山文化相比，岳石文化在陶器制作、玉石器加工、青铜冶铸以及社会结构方面进展不大，有些方面如陶器制作甚至有颓败之势，但出现了较为先进的城墙版筑技术。与同期二里头文化相比，岳石文化也明显处于劣势。当然，东夷地区的军事实力是不容忽视的，“后羿代夏”事件和多次夷、夏战争的发生即为明证。

商代中期以后至西周为文明交流与融合时期。夏代末年至早商阶段，商、夷形成联盟关系，东夷文明得以延续。但至商代白家庄期，商、夷关系恶化，商文明东渐。至商代末年，除半岛东端之外的海岱地区皆已纳入商王朝的势力范围。至西周时期，随着齐、鲁等诸侯国的分封，海岱地区文明逐渐融入华夏文明之中。

综上所述，海岱地区在中国古代文明化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无论是进入文明社会的年代，或是早期阶段的文明化程度和影响范围，都是中国较为突出的地区之一。

海岱地区的文明化进程

何德亮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海岱地区，经过广大考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已经建立起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的发展谱系。在这一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经济形态均发生不同的变化。

后李文化、北辛文化时期生产力水平相对较低，农业生产不发达，手工业技术水平比较落后。因此，没有出现城址、文字、铜器等文明因素，没有产生贫富两极分化，更没有进入文明时代的迹象。

大汶口文化时期，尤其到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阶段，由于农业的发展，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贫富分化、社会分层和等级现象日益严重，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文明化程度较前有了很大的提高，已经接近文明时代的门槛。

龙山文化时期，随着农业生产的不断发展，手工业生产技术的进步，使社会财富不断增多，由此加速了私有制的产生、贫富分化和阶级对立的形成。这一时期中国古代文明的一些因素和基本标志大多已经产生，有的见其雏形。如城的建造、文字的产生、铜器的冶铸、玉器的制作、大型宗教建筑、墓葬中随葬的成套礼仪用品以及贫富分化和阶级对立等，说明社会上已经产生不同的等级，形成了金字塔式的政治结构。特别是城址的存在，说明当时已经形成了一个强大的管理实体，只有这样一个机构，才能调集大量人力、物力来兴建巨大的建筑工程，才能调集足够的军事力量来守卫一座城市，由此看来，在海岱地区作为一个初期权力中心——国家，在龙山文化时期已经开始形成。

由于各个地区物质文化的差异，文明化的程度也有所不同，它们互为渗透，相互作用，彼此影响，从而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融合，逐渐从多源一体走向以中原为核心、以黄河和长江流域为主体的多元一统格局，这一格局的形成是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特点，而进一步完善和扩大对外交流，则成为文明化进程的必要条件。这一切，充分说明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不是一花独放，而是满天星斗。正如严文明先生所言：“中国文明不是单元而是多元起源的。不过这些文化并非彼此孤立，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和相互激发，形成一个相互作用圈。从这个意义来说，中国文明的起源又似乎是整体性的，最后发展出光辉灿烂夏、商、周文明。”

海岱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的历史回顾

燕生东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地区，考古界称之为海岱文化区、泰沂文化区、东夷文化区、齐鲁文化区，这是从不同角度对这一地区历史文化特征的表述。海岱区文明化进程涉及文明发生、发展最后融入到以中原为中心的商周文明的过程，时代跨史前、原史和历史时期即整个先秦时期。

用考古资料探索海岱地区文明化进程虽始于现代考古学刚进入中国的上世纪初，而把海岱文化区作为独立区域专门研究是上世纪 80 年代以后，在文化编年、文化面貌、谱系框架基本搞清，与文明起源有关的考古资料进一步丰富，以及具有中国有特色的文明起源研究的理论、方法与实践逐渐形成后，才成为研究的热点。

海岱地区文明化进程的探索就研究内容、角度、思路及研究者的理论依据而言，大体有四类取向。

其一是海岱地区对以中原为中心的中国文明（主要是夏商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做出的贡献，这类研究始于城子崖龙山文化的发现与研究，目前仍是研究的主要课题。

其二是海岱地区何时、如何进入文明社会，这是海岱地区文明研究的焦点，据研究者所参照的理论方法，大致说来也可分为四种：第一，按照恩格斯关于家庭、私有制、国家起源理论，通过分析墓葬制度，剖析海岱地区母系社会、父系社会、父权和军事民主等制度的形成与发展；第二，用文化人类学酋邦理论，通过分析海岱地区史前墓葬等级分化和聚落形态变迁，诠释海岱地区史前社会复杂化过程；第三，用城市、文字、金属冶炼和礼仪制度等文明因素来界定海岱地区史前社会的性质；第四，在苏秉琦先生考古学区系类型和文明起源理论指导下，结合三代城邦制度的特质，把“都邑聚”金字塔等级结构形成和城乡分离作为切入点，探讨海岱地区文明的诞生和发展。

其三是海岱区文明与夏商周文明的互动关系研究。

其四是在中国文明研究的大背景下，作为多元起源中的一元，分析海岱地区文明的形成过程、特征、原因以及这种形成模式在中国文明起源的角色和地位，这类研究将成为海岱地区文明起源研究的主流。

海岱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只是初步的，正如海岱地区文化谱系、编年框架是经过几十年考古资料的积累和研究工作才建立起来一样，海岱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也要在文明起源理论指导下经过长时期的大量田野考古、系统研究工作才会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

试论鲁东南地区的古代文明化进程

刘延常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中国古代文明的成长是一个各大文化区相互作用、相互融合的过程，而中原地区夏王朝的建立标志着中国文明的形成。各大文化区及其下的各文化小区都有一个文明起源和发展的过程，因此，具体分析文化小区的文明化进程，对讨论各大文化区文明化进程的内在动力，尤其是社会内部的演化机制将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上述，本文选择海岱地区古代文明化程度最高、文明进程比较清楚的鲁东南地区作为研究的剖面。时间上涉及大汶口文化晚期至岳石文化时期，空间上涵盖考古发现比较集中的沭河上游和沿海地区，包括山东莒县、五莲、日照和诸城、胶南、江苏连云港的部分地区。

大汶口文化晚期出现了莒县陵阳河和五莲丹土两个中心。陵阳河墓地墓葬的规格、棺槨的使用、随葬品的悬殊反映了阶层分化，并出现了文字、礼器与祭祀、象征王权的石钺等文明要素；莒县大朱家村、杭头、诸城前寨等遗址反映了不同的聚落等级。比陵阳河略晚的五莲丹土发现了城墙，反映了军事权力和公共权力的形成。据此推测，本小区大汶口文化晚期出现了具有军事、宗教权力性质的宗族中心聚落，偏晚阶段出现了更高层次的城，产生了原始古国。

龙山文化早中期的文明化进程加速发展。遗址数量剧增，聚落群呈等级分布，丹土、日照两城、尧王城和连云港藤花落均发现了城墙及大面积夯土建筑基址，胶县三里河和日照尧王城出土了铜锥、铜渣，两城镇和丹土出土了大量精美玉石器以及蛋壳陶礼器等。这些文明要素反映了生产力的显著发展，阶层分化、公共权力的集中以及军事防御和礼制的发展，具备了古国（方国）的特征，并有了大规模的地域扩展。因此，龙山文化早中期是本区古代文明化程度最高的时期。

龙山文化晚期遗址数量急剧减少，遗址的规格多较低；岳石文化时期遗址则更少，如莒县目前仅发现 8 处，但在本区南部的连云港藤花落发现了岳石文化城。该城址的龙山文化中晚期陶器有较多的绳纹、篮纹和方格纹等，具有中原龙山文化某些特征，反映了中原文化因素开始进入本区。因此，龙山文化晚期和岳石文化时期是本小区古代文明的衰亡时期。

总之，鲁东南地区的古代文明进程从大汶口文化晚期开始，至龙山文化早中期达到鼎盛，龙山文化晚期和岳石文化时期走向衰亡；在地域上，其文明化进程最早起源于小区西部的莒县陵阳河一带，初步发展于小区东部的五莲丹土一带，鼎盛时期集中在丹土、日照两城镇、尧王城为中心的东部沿海一带，偏晚时期呈现出衰亡现象，中心南移到偏居海隅的连云港一带。

古代文明在大汶口文化晚期兴起于本小区，其原因应是苏北地区大汶口文化的一支在受到良渚文化北进，以及东夷集团内部矛盾激化与挤压的影响而向本小区发展；随着良渚文化的衰亡和中原局势的变化，加之海岱地区内部的文化演变发展，使本小区的文明进程在龙山文化早中期达到鼎盛；到龙山文化晚期和岳石文化早期，海岱地区的东夷集团结成联盟，从鲁东南和鲁西北沿古黄河向西逐鹿中原，鲁东南大部地区因此走向衰落；东夷集团后来虽然出现了后羿“因夏民以代夏政”的辉煌，但已逐渐汇集和凝聚到夏王朝文明中，海岱地区的地位发生变化。

大汶口文化的南渐与文明的进程

杨立新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大汶口文化是五、六千年前分布于海岱地区的主体原始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曾发生过大规模的南渐，并扩张至整个徐淮海地区。本文着重探讨大汶口文化南渐的区域、文化内涵及文明的进程等相关问题。

一、南渐的时间与扩张的区域。

海岱地区以南的苏鲁豫皖交界地区，为《禹贡》徐州之域，又称徐淮海地区。考古资料表明，在大汶口文化南渐前，这一地区分布的原始文化与海岱区有明显的差异，而具有自己的特点。大约在大汶口文化中期，该文化开始向南强烈扩张，其中心区域，东至于海，南达淮河，西至豫东南，占据整个徐淮海地区。同时其影响的触角，还深入江淮中部，东南越过长江进入太湖流域，西界至洛河流域。这一时期是大汶口文化发展扩张的全盛时期。

二、南渐地区的文化特征。

大汶口文化在南渐过程中，逐渐融合当地土著文化，同时也与北进的良渚文化发生交流和碰撞，因而含有多重文化因素。可分为三类：甲类为大汶口文化因素，乙类为土著文化因素，丙类为良渚文化因素，其中甲类文化因素占主导地位。由于乙类文化因素的存在，使这一区域的大汶口文化具有一定的地域性，因而形成新的地方类型。至大汶口晚期，该区域来自良渚文化的因素减少，在皖北区变为尉迟寺类型。尉迟寺类型与亳州付庄上层龙山文化关系密切，其去向则演变为造律台类型。

三、南渐地区的文明进程。

综观南渐区大汶口文化的氏族经济，以稻粟种植农业为主，出现了养畜业，陶器制作业已十分成熟，同时良渚类玉器的存在，表明地区间的交换贸易得到进一步的扩大。在社会发展阶段上，已步入父系社会，男性在社会生产中处于主导地位。从墓葬材料看，氏族内部已出现私人占有和贫富分化，并出现殉人，氏族成员间的关系发生了裂变。从聚落形态看，出现一批诸如萧县金寨、怀远龙王庙、新沂花厅等中心聚落，晚期还出现类似蒙城尉迟寺环濠聚落遗址，初具早期城邦的雏形。这表明南渐区的大汶口文化在扩张中，氏族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出现了社会的分化，已逐渐出现高于氏族之上的社会公共组织和权力，开始了向文明社会的演进历程。

综上所述，大汶口文化的南渐系民族迁徙的结果，其南渐扩张的过程中经历了与本地及北上的良渚文化的碰撞，而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地域特色。同时也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孕育了一些文明的因素，开始了向文明过渡的进程。从这一点看，徐淮海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在探索文明化进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尉迟寺聚落对研究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重大贡献

王吉怀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

一、尉迟寺遗址的重大学术成果

综合尉迟寺遗址十三次发掘的成果，可以说在研究领域有着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

1. 对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聚落考古研究是一种突破。

到目前为止，尉迟寺以大型红烧土排房为特点的史前建筑遗存非常罕见，既不同于以前曾经发现的雕龙碑遗址的多间套房，也不同于姜寨的向心式布局，同时也与下王岗遗址的长屋具有区别，它一方面保留了半地穴那种古老的建筑传统，另一方面又创造了以烧烤为特点的先进的建筑形式。尉迟寺聚落的整体布局虽然没有明显的向心式格局，但从大型广场出现看，已经具备了一个具有向心力的建筑形式。对研究原始社会晚期的社会形态、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科学技术成就等方面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2. 对大汶口文化研究是一种突破。

尉迟寺遗址的考古资料弥补了大汶口文化半个多世纪以来不见完整聚落的空白。尤其是遗址中复杂的建筑格局和相对独立的居住形式，聚落的内聚和向心式布局，在大汶口文化中尚属首次发现。对研究黄淮地区大汶口文化晚期的社会性质、家庭组织结构、婚姻形态等，是非常珍贵的资料。

3. 对研究大汶口文化的分布区域是一种突破。

到目前为止，在大汶口文化分布的苏、鲁、豫、皖地区，尉迟寺遗址是经过发掘的最南部的一处遗存。而皖北地区是大汶口文化的主要分布区之一，目前所知皖北地区至少分布有大汶口文化遗存达四五十处，这种现象说明，大汶口文化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阶段的皖北地区有着强盛的发展势头，这也是九十年代以来，在研究大汶口文化分布区域方面的一个新的进展。

4. 对研究古代文明的起源问题是一种突破。

如果说尉迟寺是原始村，倒不如说是原始城，这里我们已经看到了文明的曙光。规模宏大的围壕，不仅具有排水、蓄水的功能，而且已经起到了对聚落的防护作用。而无论是护城河还是护城墙，都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文明时代出现的基本要素，所以尉迟寺遗址的资料，可以加快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的进程。

二、简短结语

尉迟寺聚落遗址的资料，以重大的学术价值，填补了中国史前聚落考古的薄弱环节。充实了史学界对黄淮地区史前文化发展程度的认识，对研究古代文明起源问题增加了有价值的资料，同时，也在苏、鲁、豫、皖史前考古研究重大课题中发挥了带头作用。

试析景阳岗龙山文化城址

——也谈海岱对中原文明的影响

王守功 李繁玲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二十世纪末叶，伴随着众多龙山城址在大河上下、长江南北的发现，聚落考古与古代文明研究的不断深入，在山东鲁西北的阳谷县，发现了景阳岗龙山文化城址。城址的发现，引起考古界对这一地区龙山文化的关注和研究，先后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发现一些面积较大的龙山文化遗址，并由此促进人们对景阳岗城址的地位及在中国古代文明的作用等问题的思索。

钻探、试掘资料证明，景阳岗龙山文化城址具有明显的特征。

- 1、在鲁西、豫东地区，存在许多堽堆遗址，景阳岗龙山文化城址是这种堽堆遗址的代表。
- 2、景阳岗城址内总体格局十分清楚，五个台基界限明显。
- 3、城址延续时间相对较短，在龙山文化后，该城址就废弃。此后，直至东周时期，才有人在龙山时代的城址内生活。
- 4、文化面貌具有过渡地带的特征。
- 5、结合景阳岗龙山文化的发现与考古工作，在鲁西北地区发现许多龙山时期的重要遗址，有的可能为城址或环壕遗址，说明龙山时期该地区文化的繁荣。

随着鲁西北地区龙山文化的发现和不断被认识，人们开始探讨这一地区龙山文化的性质及归属问题，并引发人们对山东地区古代文明有关问题的讨论。有学者根据古史传说与鲁北地区考古资料分析，认为景阳岗龙山文化城址与虞舜有关。

关于帝舜的传说及地望分析，有许多学者曾作过深入的探讨。大多认为，古史传说中帝舜发迹之地，应在鲁东南地区，其活动地望，大致在鲁东南、鲁中南、豫东一带。综观古代东方的历史传说，其早者为蚩尤氏，次之以太皞、少皞、帝俊（舜）氏，其再次而记载最多者则莫过于后羿。笔者曾根据山东史前文化的分区及古史传说分析，将海岱地区大致可分为三个大的文化区：鲁南区、鲁北区及胶东区。帝舜传说及活动地望主要集中在鲁南区；鲁北地区为传说中后羿的活动区域；胶东由于远离中原，古代文献中不见其古史传说。景阳岗城址属于鲁北地区，其所在位置应在后羿向西迁徙的线路上，因此，其出现和消亡应与后羿势力的消长有关。

典籍中有许多关于羿的记载，所述的事迹分为两类：一类为羿射九日；另一类是后羿乱夏。有汉以来，历史学家认为二者为不同之“羿”。其实“羿”、“后羿”均为东方夷人中某一族团或族团首领的称号。“射日”与“乱夏”是夷羿族团发生的两个对中国古史有深刻影响的事件，前者产生在大汶口文化晚期至龙山文化早期，后者则应在夏代初期。夷羿族团是一个古老的族团，其发迹于鲁北地区，后向西经鲁中、鲁西北进入河南，曾一度夺取夏王朝的统治地位，并对中原物质文化产生深刻的影响。夏少康复国后，夷羿族团势力受到打击，除少部分留居河南外，大多

退居山东腹地。

表现在物质文化上，中原地区龙山文化中的王油坊类型应为东夷集团创造的物质文化。在新密周围发现的新砦期文化，尽管目前对其性质尚需探讨，但其文化中存在大量山东龙山文化的因素，以鼎、鬲为主要炊具的特点与其他河南龙山文化有明显的不同。

其实，海岱地区文化对中原地区较大规模的影响早在大汶口文化时期就已经开始。从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开始，沿颍河流域向西北一直影响至山西的南部和陕西的东部地区，并促使这些地区物质文化的改观。在中原地区，庙底沟二期文化开始物质文化发生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应与大汶口文化向西发展有关。

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海岱文化对中原地区有两次大规模的影响，也可以称为两次大规模的“西进”活动。第一次发生在大汶口文化的中、晚期，主要是鲁南地区虞舜族团的力量，此次西进导致仰韶文化物质文化面貌的改观；第二次发生在龙山文化时期，主要由鲁北地区后羿族团完成的，对夏代文明的形成及夏代早期的国家政权产生深刻的影响。

古代文明的发展可分为孕育、产生、成熟三个发展阶段。大汶口文化时期为孕育期，龙山时代为产生期，夏、商为成熟期。因此，在三个阶段中，海岱文化对中原及整个中国古代文明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景阳岗龙山文化城址是在这种影响过程中产生和消亡的。

（上接 20 页）

此后，在鲁东南、胶莱和鲁北一带演化出了十分发达的龙山文化。鲁北平原区出现了密集的聚落群和 10 余处城址，并出现了文字，成为这一时期的文化最发达区域，而鲁西南龙山文化只是在晚期才有所振兴，它们虽与本地原大汶口文化不无关系，但更与鲁北和中原文化有密切的关联。龙山文化晚期的鲁北、鲁西北出现了与先前鲁西南的“龟占”不同的“骨卜”风俗，还出现了素面陶鬲，这些中原文化东进的结果后来竟成为海岱古文化的重要因素。这一时期玉、石、陶器制作技术均已达极致，铜业也发展起来。龙山文化对中原的西进扩张，最终以失败告终，文明进程出现了衰退，但若干因素却对中原文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胶东地区一直相对温顺地主要是接受西部的影响，较为顽固地保持了本地域的文化传统，文明演化相对较为迟缓。

总之，海岱地区的文化是一个大的文化共同体，但各地文化发展并不始终是同祖单线传承，无论是从整个地区还是本区域内的局部地区来看，每一次重大的文化转折都与外地域文化的作用有密切的关联，其中大汶口晚期文化的东进和西进、中原地区龙山晚期文化东进和海岱龙山晚期文化的西进、商文化的东渐对海岱地区的文明演化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海岱地区文明演化的全过程具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即“多元整合过程中的一体化趋向”。

从齐鲁之别谈起

——海岱地区文明演化的多元视角

朔 知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一

海岱地区文化的最终一体化，有赖于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与列国战争所导致的大范围文化交流、秦中央政权的一系列同化政策等多种因素。在此之前，以齐、鲁为代表的海岱地区多个区域的文化之间有着相当的区域差异。

齐、鲁之别自有其自然原因和历史渊源。齐国所辖核心区域为滨海的平原和丘陵，因鲁中山地之隔而类似于半岛状态，其文化是由当地的后李文化发展而来；鲁国所辖核心区域则是山前平原，背靠鲁中山地而面向广阔的华北大平原，其文化则是由与中原裴李岗文化可能有关的北辛文化发展而来，文化渊源的不同预示了两者文化差异的必然性。虽然两者在大汶口文化以后各个时期均有一体化的趋势，但直至商代却始终有着多元化的表现。

这种文化的差异在胶东、鲁西北等地区也有明显的表现。因此，海岱地区的古文化并不能简单地视为北辛——大汶口——龙山——岳石文化的单线传承，而是有着较为复杂的传承关系。讨论海岱地区文明的演化，不能不考虑到文化的多元化因素。

二

在相当于大汶口文化早、中期阶段，海岱地区内部的文化交流主要表现为东渐的形式，即鲁北、胶东递次受到鲁西南的影响；与外部的交流主要表现为中原的庙底沟文化和后岗一期文化的东进，影响所及以鲁西南为主。在此基础上，于中期阶段在鲁西南汶泗流域山前平原地带形成了一个明显较海岱其他区域发达的文化中心。这一时期若干手工业技术如轮制、管钻开始逐渐发展，拔牙、枕骨变形、龟占等宗教、风俗开始流行，其中鲁西南更以随葬骨牙雕筒、龟甲器和獠牙器而彰显，鲁北、胶东则有所不同。

在晚期阶段，海岱地区的文化发展具有了三个新的特点：一是对外的殖民扩张，二是文化中心的转移，三是若干技术的突破。这一时期与外部的文化交流方向发生了转变，出现了西进趋势，整个皖北和豫东南几乎都成为其分布地域。与此同时，鲁西南文化已显衰落，而在鲁东南沂沭流域的丘陵山地中，原本根基极浅的文化却异乎寻常地发达起来，但它又明显不同于鲁西南早一阶段的文化，既有传承也有变异，并出现了大量酒具。殖民扩张和中心转移向东西两个方向的同时发生和老中心区的衰落，似与外力的作用有关。这一时期的手工业技术中，陶器轮制、石器管钻技术已普遍运用，薄胎成形和陶器烧制技术趋于成熟，冶铜、城墙、图形文字已经出现，并主要发生在鲁东南地区。

(下转 19 页)

动态环境中的聚落系统：中国安阳的区域性考古调查

荆志淳 唐际根

(加拿大 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与社会学系；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

安阳是商代晚期国都所在地。安阳城内早期聚落素以殷墟闻名，作为商文明研究的焦点，对其进行的考古学调查研究已逾 70 余年。本文将论述过去五年中对洹河流域进行的区域性系统调查的主要收获。

聚落等级是社会组织复杂化程度的最佳标志，有助于确定聚落结合的程度和政治体系中的等级数量。安阳是晚商时期的政治中心，因此我们对这一地区进行的区域性系统调查的重点是洹河流域聚落模式的变化，考察其从早期农村公社到有组织的国家社会的发展过程。

这一地区最早出现的聚落属仰韶时代（公元前 5000—3000 年），有两个等级，表明当时的政治体系属于简单的酋邦社会。继此之后的龙山时代（公元前 3000—2000 年），聚落的数量和领地面积均急剧增长，较大的中心发展为三级聚落结构，说明这一地区已进入复杂的酋邦社会。

与龙山文化聚落的扩展不同的是，此后直到早商时期（公元前 2000—1400 年）聚落数量明显减少。所有的遗址面积均非常小，而且不见中心聚落。到了中商时期（公元前 1400—1250 年），聚落的数量才又增多。商王朝很可能在这一地区建立了级别最高的城市——洹北商城。晚商时期（公元前 1250—1050 年）聚落的数量和面积进一步增大，这一时期的最为重大的事件是商代最后一个都城殷墟的建立。

公元前 11 世纪中叶庞大的商王朝被周王朝征服之后，繁荣的盛况迅速消退，聚落模式也随之遭受了一次深刻的变革，殷墟及其附近很少发现西周的聚落。甚至在整个西周时期（公元前 1050—771 年），这一地区均未出现中心聚落。

到了东周时期（公元前 771—221 年），聚落模式又一次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东周早期开始便有大批居民重新入居此地。

欲解释人类社会所发生的变革，对环境变迁与聚落模式发展相互关系的研究是至关重要的。与其他地区地理环境只是为人类活动提供了一个被动的背景不同，洹河流域的区域性考古调查表明地貌的演化过程对于研究聚落模式的变迁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我们的研究揭示出地层序列的复杂性，是由于水流与风力的交互作用促进地貌进化的结果。全新世中期风力和冲击沉积的古土壤已被识别出来，这对于更好地理解遗址形成的古地理学背景具有重要意义，更重要的是对解释史前和早期历史时期的聚落模式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同时对于考古调查采用合适的方法和技术也具有很大的启发。将古土壤研究列入区域性系统调查计划，最直接的成果便是商代中期城墙环绕的洹北商城的发现。

蒙城尉迟寺大汶口文化聚落与社会

魏峻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尉迟寺遗址位于安徽省蒙城县东北 20 公里的一处高出周围地面 2~3 米的台地上, 钻探得知遗址面积约 10 万平方米。自 1989 年开始社科院考古所安徽队在 7 年间先后 9 次在该遗址发掘 7000 m², 揭露出一处有椭圆形围沟环绕的南北长 230~240、东西跨度约 220 米的大汶口文化聚落。该聚落内清理出大汶口文化晚期的房址 41 间(其中排房 12 组 39 间)、墓葬 192 座以及大量的灰坑。这些遗迹单位在时间上虽然略有参差, 但大体上可以将它们视为同时期聚落的有机组成部分。《蒙城尉迟寺》报告的出版为我们分析这一大汶口文化的聚落结构及其社会状况提供了基础的资料。

一、尉迟寺聚落发展的时间框架

发掘者分析了尉迟寺聚落的遗迹间叠压打破关系和出土器物的形态变化后认为, 这些遗存可以分为前后衔接的三个发展时段。本文则参考层位关系以及大口尊、陶鬲、薄胎高柄杯、背壶、觚形杯、陶甗等器物的形态变化, 将尉迟寺聚落的发展过程调整为两期三段。

二、房屋建筑与墓地结构分析

尉迟寺聚落的房屋与墓葬之间存在着结构上的同构性。简单的讲, 该聚落的大汶口文化墓葬从空间上可以分成两个墓区, 每个墓区又区别为墓群、墓组和墓列三个层次, 后三者又分别同聚落中的单间大屋、屋组和建筑单元相对应。它们应该代表了不同级别的血缘亲族组织。

三、社会状况

房屋建筑和墓葬资料显示尉迟寺聚落中生活的社群具有如下特点:

1. 聚落内的不同家族间存在着生活方式和习惯的差别;
2. 男女两性在社会财富占有量上差别不大, 不同年龄段的死者中以中年和壮年占有随葬品最多, 但它们同其他年龄段的死者在随葬品占有量上的差别并不显著;
3. 家族间的分化程度同样较低, 强烈的表现为随葬品数量差异较小, 虽然女性死者占有的葬品量要稍多于男性, 但两性的社会地位并无根本的不同。当时整个社群的人们仍旧生活在相当“平等”的社会中;
4. 从遗址规模和出土物规格来看, 尉迟寺聚落并不具有区域性中心聚落的地位。

胶东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地理分布及相关认识

王富强

(山东省烟台市博物馆)

本文以烟台地区为主要地理单元，初步对胶东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地理分布进行了量化分析，归纳出了胶东新石器时代遗址分布的六个特点：

- 1、胶东贝丘文化时期，经过早期向海洋的探索后，聚落址迅速在沿海地带发展起来，并在贝丘文化晚期开始由沿海贝丘较集中的区域向半岛腹地分化；
- 2、到杨家圈一期，胶东聚落则在半岛高丘或山坡地带萎缩发展，进入了一个调整阶段；
- 3、新石器时代晚期，在山东龙山文化大发展的背景下，胶东新石器聚落又重新活跃起来；
- 4、在胶东新石器聚落的演变过程中，“择高地而居”的传统始终或多或少地延续着；
- 5、莱州等滨海冲积平原直到新石器时代晚期聚落址才明显增多；
- 6、庙岛群岛由于地理位置独特，聚落址一直处在较稳定发展的态势中。进而指出胶东新石器时代存在着四大生存带，除海岛生存带外，沿海丘陵、半岛腹地山谷和滨海冲积平原三大生存带都出现过较大的波动，各聚落址也正是在这种波动中进行着分化和组合。

同时，结合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对胶东新石器文化的源头进行了重新思考，在分析了海上起源的障碍性、半岛腹地起源的不确定性及山东腹地起源的可能性的基础上，提出胶东新石器文化起源是突变式的，是人类在探知海洋过程中创造的，兼具陆生性和海洋性，体现出一种边缘地带的独特形态，并且认为山东腹地文化为初级源，胶东新石器文化应是次级源。

此外，又根据胶东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演变趋势，对胶东新石器时代聚落演变的原因进行了探讨，讨论了贝丘聚落的分化、新石器时代中期聚落的衰落以及胶东新石器时代晚期聚落大发展的若干因素，论述了从采集、狩猎和渔猎等混合经济向农业经济过渡这一复杂的波浪式演进过程。并进一步阐明人口膨胀的压力、生态资源的有限性、因地理环境所导致的经济模式的单一性和局限性，才是胶东新石器时代聚落演变的根本原因，从而大致概括出胶东新石器文化独特的发展态势。

试论尚庄三期文化

——夏代东夷文化探索

王恩田

(山东省博物馆)

山东茌平尚庄遗址第一次发掘简报把新石器时代遗存分为三类考古学文化：尚庄第一期文化属于大汶口文化；尚庄第二期文化属于山东龙山文化；尚庄第三期文化是一种新型的考古学文化。尚庄发掘报告混淆了尚庄二、三期文化的区别，把两者合并为龙山文化，认为尚庄三期文化“具有更浓厚的山东龙山文化色彩”，值得讨论。

一、尚庄三期文化是一种新型的考古学文化

1、尚庄二三期文化的主要区别

尚庄三期文化窖穴数量增加、大型窖穴出现、出现大面积夯土建筑和城址、生产工具出现了蚌镰、陶器数量增加，大型厚重容器出现；炊器中的鬲消失，新出现了甗和鬲；鼎由夹砂变为泥质、从炊器变为盛食器；瓦足盘消失被圈足盘取代；形式多样的器盖；制法上鸟头形鼎足数量减少并且趋于简化、子母口、宽扁横耳和紧贴器壁的半环状耳的盛行；出现了卜骨和猎头现象。

2、尚庄发掘简报对尚庄二三期文化的混淆

- (1) 所谓长流袋足的“II2式和III2式鬲，两期都存在”问题。
- (2) 出土夹砂盆形鸟头形足鼎的H146的年代问题。

二、尚庄三期文化与山东龙山文化姚官庄类型的主要区别。

三、尚庄三期文化与河南龙山文化（后岗二期文化）的主要区别。

四、尚庄三期文化是龙山文化与岳石文化之间的过渡形态。

五、夏代东夷文化探索

- (一) 山东龙山文化晚期（尚庄三期文化与二里头文化一二期约略平行）
- (二) 尚庄三期文化与二里头三四期约略平行。
- (三) 岳石文化早期与二里岗早商文化南关外期或稍早约略平行。晚期与二里岗早商文化白家庄期或稍晚约略平行。

结论：山东龙山文化晚期和尚庄三期文化是夏代东夷文化。岳石文化是早商时代早期的东夷文化。

The origination and spread of slit rings in the East Asia

Tang Chung

(Centre for Chinese Archaeology and Art)

Recent archaeological researches have revealed that slit rings might have originated from East Asia and were possibly the most widely worn ornaments throughout the human history of East Asia. Ancient slit rings have been found from Siberia to the Malaysia as well as on most of the islands off the coasts of East Asia. The pair of slit rings uncovered from the sides of a human skull from the Xinglongwa site in Inner Mongolia in the early 1980s yielded an astonishing C-14 date of more than 8000 years b.p. It is exciting to learn that most of the slit rings from Xinglongwa Culture are on nephrite. It is known to all that gold and jade are respectively the supreme emblems representing ancient material cultures in the West and the East. That nephrite was used in making the oldest slit rings in East Asia has made these jade traditions even more mysterious and fascinating! Up till now, we only have a sketchy picture of the history of these ornaments.

The origin of East Asian slit rings still awaits a final conclusion. Why slit rings of similar styles appeared in different East Asian regions in the prehistoric period? Were these regions correlated through cultural exchanges? The social functions of slit rings and how these rings were used in different periods and different regions are topics demanding in-depth investigation. Due to inadequate archaeological exchanges between different regions and the presence of language barriers (between English, Russian, Chinese, Japanese, Vietnamese and French) over the past years, the integrated study of East Asian slit rings remains at its rudimentary stage.

The foremost objective of this essay is to reconstruct the chronology of East Asian slit rings in the early period and to establish the date, regional distribution, stylistic variation and changing process of these ornaments from different East Asian regions.

在史前社会中应努力发挥历史文献的作用

马良民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

本文旨在指出在先秦文献中保存着许多史前遗存，这些遗存作为研究资料还未全部利用起来。如果把它们全部发掘出来加以利用，会使我们的研究工作少走一些弯路。这里所说的“史前遗存”，是指保存在先秦礼俗、典章制度、亲属称谓、传说和神话故事中可溯源至原始社会的那部分内容。其中以礼俗制度和亲属称谓中的遗存最为重要，它不仅真实可靠，内容也广，从婚姻家庭、亲属关系、社会组织结构、管理模式到宗教信仰等方面都有涉及。这些遗存尽管残缺不全，甚至已经变形或仅存痕迹，但都能或多或少的向我们提供一些有用信息，从中可以看到史前社会的某些片断，发现社会演进中的某些环节和部分轨迹。把这些发现引入文明起源的研究，肯定会大有裨益。今试举例说明。

1、在夏商周三代，凡建国必先立庙置社，作为政权标志。庙是祖庙，供祭国君的祖先；祖神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国君行事都要得到它的认可，所以它既是家族利益的维护者也是君权的象征。社是地域组织之神，是扩大了村社神，公众利益的维护者，是民权的象征。这两种神利益趋向不同，而同时以其庙、坛作为国家的标志，这里面显然包含着一种社会政治权力的分配。而国家权力的分配又取决于社会组织 and 政治结构模式。由此推其原始，国家应是在一种由地域组织形成的社会结构中长成的。即社的基层单位是由父系家族组成的村社，村的社头人由某个家族的族长担任；多个村社组成村社联合体，以最有势力的村社的头人为首领；小联合体又组成大联合体，首领由最强的小联合体的首领担任。如此层层联合而形成更大的联合体。每个层级的联合体都立一个公共的社神为其标志，为了维护公共利益，每个层级的各个单位可能还有一个由相关首领、头人组成的议事会。大小首领都在家族内世袭，以祖先的名誉对辖区实施管理之职。如此以来，就形成了大联合体对次级联合体、次级联合体对小联合体、小联合体对村社的层层管辖。

总之，我国古代国家出现前的社会基本是以村社为基层单位的各种地域组织，由村社联合体经由酋邦发展为国家，那种认为中华古国脱胎于氏族部落联盟的说法是靠不住的。

2、《左传·昭公十七年》：

秋，郟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子问焉，曰：“少皞氏鸟名官，何故也？”郟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大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祝鸠氏，司徒也；且鸟 鸠氏，司马也；鵙鸠氏，司空也；爽鸠氏，司寇也；鶡鸠氏，司事也。五鸠，鸠民者也。五雉，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为九农正，扈民无淫者也。自颛顼以来，不能纪远，乃纪于近，为民师而命以民事，则不能故也。

这里面的云、火、云、龙、鸟都是图腾，少皞集团以之名官的鸟名下缀有“氏”字，说明它

们各为一个图腾集团，可知当时还有氏族组织。到少皞氏之衰，颛顼氏崛起，一改旧制，“为民师，而命以民事”，即以民事命官，管理对象不再是氏族，而是从氏族制度中解脱出来的村社社民。

与此相应，颛顼还进行了宗教改革，设立专职祭祀，“绝天地通”，结束了“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政事神事不分相互干扰的局面，把祭权控制起来，为其服务。从这两项改革看，颛顼似乎已建立起了一个在一定程度上中央集权性质的管理系统和至高无上的个人权威，但据《鲁语》“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颛顼能修之”看，此时尚未形成财产的私有制度，其政权不具备国家性质，应是一个酋邦，这个结论他人已经提出，我在这里只是谈谈有关它的政治改革材料。

3、通过探讨姓、氏的起源可揭示其所产生时代的社会背景。先秦的姓是外婚制的亲族组织，或称之为“氏族”，相当于民族学里的氏族。氏族本来以图腾为名，那么何时改为姓，而姓与图腾有何不同呢，据摩尔根研究：“当世系由男姓下传之后，就用人名作为姓氏了。在氏族史上著名的某人即成为该氏族以之命名的祖先”。马克思认为姓的产生“可能在世系按男系计算以后或更早一些”。在我国，先秦表姓的字一般带有女旁，可知以之命为姓号的那位祖先是位女性。郑玄注《周礼·司士》曰：“姓，生也”。《诗·杖杜》毛传：“同姓，同祖也”。可证姓确是一母所生后代血亲的总名。由此可知，姓的发生应植根于母系氏族。众所周知，先秦的氏是姓的分支，为家族或宗族名。但有时姓氏连用作为女性的名字，如“姜氏”，“氏”等，其中的姓为氏号。由此可知姓和氏原初为一体之族。因此之故，有人说史前姓与氏的区分没有严格意义。此说不切，应该是姓、氏同源，那么氏即为家族之称，则初时的姓亦当如此。推其原始，则非母系家族莫属。现今所知的古姓，应是氏族首领所在母系家族的一位族长的名字，该家族以此人为女祖。或曰：“姓本来就是氏族，姓号是氏族的女祖”。不然，氏族素以图腾命名，图腾不是姓，赞比亚本巴人的男子身属母系氏族，从母系氏族中认祖，而姓却承自父亲，可见初时的姓不是氏族。那么姓后来何以升为氏族名了呢？这与氏系的转变和氏族首领权势的膨胀有关。这是因为世系由母系向父系的转变从一开始就打破了图腾集团单一的母系血亲原则，使母系家族变为既按母系也按父系计算血亲双系亲族集团，导致图腾陷于名不符实的境地而步入衰途；在进入父系氏族社会以后，终因被它牵连着的母系亲族关系与社会的进展越来越不相适应而被废除。与此相应，随着氏族首领权势的日增和首领一职在其家族内世袭的结果，逐渐把该家族的女族推上了氏族共祭的神位而变为氏族的共组，其姓也随之升格正式代替图腾为氏族名。其他的各个家族便成了它的分支，不得再自命为姓而命之曰氏。“氏”的本义是水的支流，借以指称家族，是再恰当不过的。这样以来，对首领的家族来说，它是氏族内其他各家的宗主，氏号和姓号在其家族内是重合的，所以姓号可用作氏号，“姜氏”，意思是姜姓首族之女。实际上，到了周代凡贵族之女皆可以姓加氏号的方式名之，这是流变的结果。下至秦汉，把氏改称姓，所谓张氏、李氏，才是真正的氏号。

上论使我们发现，母系氏族分为若干母系大家族是我国姓氏同源的唯一社会因素，从而使过去认为我国古代有母系大家族的设想得以证实，也为母系向父系转变的途径——通过母系大家族内部的变革来实现——增加了一个证据，而这些在文献的字面上是看不到的。

由上举三例可以看到，文献中的史前遗存很有潜力可挖。只要我们借助民族学知识使用历史溯源法去努力发掘，定会发现许多历史残章碎篇。以此来研究考古资料，就会减少或避免盲目猜测，做到有目的、有根据地思考问题。

东方与文明研究举隅

——关于古汉字起源于宗教的假说

孙敬明

(山东省潍坊市博物馆)

如所周知，有关古汉字起源的年代、环境、相关人物与事件诸种，自汉代以来即众说迭出，后世各家则宗法异门。迄于现代随科学考古资料积渐而丰富，人们对此历史课题探求的欲望愈发突出。尤其考古学界大致相约而成的，关于人类文明起源的三项重要标志之一，即此文字的观点的流行，其不但使传统小学和今日严格意义上的古文字学界，将此视为学科热切研究追寻的永恒的主题；而且相关各界尤其考古研究，对此问题则更是密切关注。毋庸讳言，尽管研究者对确立文明的重要标志是否就此三项，甚至还有更多，迄已渐生歧义。但是，无论从西方考古学理论的诠释，还是从中国固有的传统国粹经典文义来注释，尤其在东方中国这块古老的大地上，文字与文明的关系则显得须臾不可或离而至关紧要。所以，今天不但传统的探讨古汉字起源的思维方式与方法手段，因考古的介入而要求发生大的变化，而且在这种考古学文化高度发达，区域特点最为明显，尤其文字的构成要素与西方而大相别异的东方，其既需要考古学提供更丰富的相关研究证据资料，同时，亦更希望考古学在研究早期文明时相关把古汉字的起源纳于学术研究的范畴，因为只有这样的研究与探索，才能真正把握东方文明与文字间的内在规律。

《左传》有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经检索先秦典籍与考古资料合证，祭祀与征战确乃当时首要。其中宗教祭祀，溯其源来更比战争要早，或可谓宗教与人类同始，今日揆之，不无道理。当人类历史的步履迈进文明之门的同时，而作为文明重要标志的文字即已创生。由大汶口文化陶尊上的刻划文字出现的时间、分布区域和所在器类的组合及特征，足可证明其文字与器物的理想用途在于宗教。再从文字意义，亦不外乎天、地、农事、征战诸范畴。同时，比证其他考古学文化区域有关陶器上所谓古汉字的刻符，甚至是岩石上的勒画，或从某些因素推求，他们亦或具有某种意义上的文字之功能，但若与大汶口文化陶文相比，则显得尤为逊色。由此或可推断文字出现与文明诞生应是多元而发展则是明显不平衡的，在各处发展的进程中，有的承继一贯连绵发展，有的则中间脱失淹没无闻。而以大汶口文化陶文为主的刻符，则缘由宗教祭祀而创生于人类文明之初，继而绵延至今为历史最久的古汉字。

再下按三代，文字所用于甲骨，旨在宗教；商周青铜彝器文字所用亦多与宗教相关。并且此时文字早已规范，而其源于宗教用于宗教的主旨，亦在发生变化，即文字正脱出宗教之门，而为社会广泛所应用创造远阔前景。本文并非直接探求古文字起源，而仅是从思维观念上提出一种假说而已。

试析二里头文化晚期陶器中的外来因素

朱君孝 李清临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考古联合重点实验室)

对二里头文化性质的讨论，曾经出现很多种观点。涉及夏商分界的主要是以下四种，即分别从二里头类型文化的一、二期；二、三期；三、四期及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冈文化下层之间划界，此界线之前为夏文化，其后则为商（代）文化。其中以二、三期之间划分夏商的观点占优。随着考古资料的不断丰富和研究的逐渐深入，特别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实施，二里头一至四期为一个连续发展的整体、其主体属于夏文化的认识已成为主流。但争论依然存在，主要分歧在于对第四期的认识上，即：二里头四期属于夏文化还是商代的（后夏）文化？

很多学者根据遗迹、遗物的演变，并结合碳十四测年结果，将夏商分界划定在二里头三、四期之间。同时另外一些学者仍然坚信，二里岗文化是早商文化，而分布在传说中夏人活动中心地区、文化面貌不同于二里岗文化、在年代上早于二里岗文化的二里头文化只能是夏文化；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是一个整体，不能拆分为夏、商两种文化或两个朝代的文化。

通过对二里头遗址一至四期陶器的仔细观察，我们认为，总的说来二、三、四各期比之前一期的变化是渐进式的，不过四期陶器中的新因素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内涵上看都更加显著：一些在早期常用的器类急剧减少以至消失，同时另一些器类数量大增，或出现新的器形，尤其引人注目是一些外来文化因素。于是，在以往多位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对二里头晚期陶器中的外来因素进行了一番梳理，将其归为商文化因素和岳石文化因素两大类，并将这些商式和岳石风格的陶器分别与其来源地的同类器物作一器形学对比分析，判定其年代在二里冈下层前后。据此，我们推断，当二里头文化发展到第四期时，岳石文化因素与下七垣文化因素同时而且大量地来到二里头文化的核心地带，很可能表明这两种文化的使用者——商族及其盟友东夷人已经控制了二里头地区，取代了夏人，成为中原地区的新统治者。因此我们赞同二里头遗址第一至三期是夏文化，而四期是进入商代纪年的夏遗民的文化观点。

商源东方的精神文明线索

程一凡
(哈佛大学)

商人东来之说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已有徐中舒、傅斯年等诸家提起，但缺乏考古学的实据。已故张光直先生在二十多年前提出了较为进步的论证，但还不够全面。

国内考古界近年在先商、商源的问题上讨论非常蓬勃。除了典籍论证以外，大都侧重器物的类型比较，本文讨论则着眼精神文明的迹象。盖精神文明非一朝一夕可扭转或骤变的，故踪迹难隐。本文论证分三部份：

1) 社会架构标志：比较早商与龙山、岳石文化中有代表社会权位性质的礼器，如耜形端刃器（旧称玉璋）、玉戚、玉戈、玉刀等。

2) 宗教习俗：从身饰、玩物开始，比较到日常用品（如龟囊）到宗教程序（如钻灼卜骨）。由物件所有权的注记（如大口尊上的刻划符号）到葬俗（如殉狗），显示出大汶口文化到商文化间的连续性。

3) 普及美感：绿松石的广泛使用与镶嵌工艺是大汶口文化的特色，陶器的镂孔花纹亦颇盛行，二者皆为商文化所继承。云雷纹、夔纹、饕餮纹更是东方民族独特发展出的带有精神意义的纹样。在二里头三期起的铜牌饰、玉饰、骨雕、陶器纹饰中亦充分发挥。从二里头三期起到偃师商城，和郑州诸遗址、安阳诸遗址，商文化的体现是一脉的。这一脉的文化仰袭大汶口以来东方沿海族属文化的特色，而这些表征自二里头文化二期向前推（除了二期极晚段以外）却又阙如，那么殷人东源的精神文明脐带应是凸显而明确的了。

郑州商城外郭城的发现和研究

袁广阔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一、郑州商城外郭城的发现

郑州商城外郭城南墙的发现距今已经五十年，在这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内，商城考古一直没有停顿。1993年、2000年、2001年和2002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多次对城址进行了考古钻探和发掘，证明郑州商城的外郭城应是商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通过城墙、城河以及东部大的湖水包围商城内城一周的。

1、南外墙与城河的发掘

2000年发掘的紫荆山南路外城墙基，断面呈倒梯形，槽壁较斜直，目前发现墙体残宽12.5—14.4米，残存高度0.4—0.6米，基槽加墙体总高度为2.2—2.4米。护城壕与城墙走向平行，中间有10米的过渡地带，由于当时地面不太平整，在挖掘城河前，先用土将过渡地带的低洼地带进行了铺垫，为了保证其质量，垫土也经过夯打。城河内坡向下斜直，底部较平，坡面修筑的相当平整，而且还在护城壕的北坡原来较低洼和不平整的地方经过了多次修复，加固护坡。该护城壕口宽约为24米，底宽为12米。最深处距现代地表7米深。

2、西墙的试掘

1993年，郑州商城工作站在郑州饭店扩建工程中在福寿街西侧，兴隆街北侧的交汇处，发现商代外城西城墙从基建区中部呈南北向穿过，发掘出的夯土城墙长约58米。基础槽口宽14米，底宽11米，深1.10米，夯土基槽填满后，再修筑地面上的城墙，地面上墙体略宽于基础，宽度一般在16米，地面上部分已被破坏较残，保留厚度较薄。最厚为0.80米，目前城墙夯土保存最厚的为1.85米（包括基础槽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郑州饭店扩建工程中发现的外城西城墙位于1986—1987调查与发掘的自振兴商场经群众剧院黄和平大厦东南侧、中原大厦东边、郑州长途汽车站停车场，穿过兴隆街至福寿街北段的西城墙的北部，二者间距约有40米，即在这一段存在两条平行的外城墙。

3、北墙的钻探

北墙的钻探是2002年3月开始的，因钻探的地点是市区的中心，整个地面都已经硬化，我们仅仅是沿着内城北部的几条东西向的街道旁边的树坑钻探的，因此钻探的范围受到了很大的限制。我们依据北部文化层的范围沿文化层向北钻探，首先在纬三路北约100米的经五路上，发现了夯土，然后向东在一处印刷厂的院内也发现了夯土，夯土距地表4.05米，土色黄灰，质地坚硬，厚约10厘米，夯土向下为黄砂土，包含有堰石块。该地点同经五路上发现夯土东西在一条直线上，二者相距约100米。沿印刷厂的院内发现的夯土向北钻探，4.3米左右即见生土，在距离夯土10米处，地势变低，在距地表6.2米处发现黑灰色淤土，至7米未见底。这里距内城约900米左右，它同我们已经发掘的紫荆山路的城墙与城河的情况很一致，都是距城墙10米远发现的护城壕。

4、东墙的调查

2002年春，我们依据《郑州二里岗》中提供夯土的资料，于市木材公司货场南部找到了夯土，并顺其走向东南现今凤凰台村西的高岗上，再向东便是低地，距地表2米以下，地下水开始涌出，无法继续钻探。但从凤凰台向西北经郑汴路、商城路西部靠近城东路的玻璃厂、皮鞋厂一带地势较高，仍有商代文化层存在。沿城东路至出北路距离内城约200米，在郑州棉麻厂院内地质钻探表明这里曾经是一处湖泊，探出的青灰色淤泥13米仍然没有到底。从城北路再向北至白家庄、司家装一带地势又变高，又发现商代文化层。东部至经四路地下水位开始上升，无法钻探。依据我们钻探的情况，结合玻璃厂、皮鞋厂的考古发掘，我们大致勾画出了东部湖泊的西部边缘。

外城依据目前的发现只剩下基槽部分，它的筑法是，先挖一条口部略宽于底部的基础槽，然后填土分层夯实。夯土墙基础槽口宽14米左右，槽深1.2—1.8米。如果地势不平，或基槽无法挖掘到1米以上的深度时则要用垫土的方法，垫到要求的深度，再向下挖掘基槽，由此可知外墙基础的要求是十分严格的。外城墙之外是10余米的过渡地带，然后是宽约40余米的护城河。从以上发现的诸段夯土基槽形制、槽内夯土层的筑法、夯窝印痕、夯土颜色和夯土层内包含的碎陶片等方面看，这几段夯土墙基的时代是属于同一时期的一个大型遗迹——外郭城墙。

二、外郭城与内城的关系

外郭城墙基的筑法是，在夯土墙的下面先挖一口部略宽于底部的深达1—1.8米的基础槽，然后夯筑地上部分的墙体。而内城是平地起建的，四面城墙没有真正的基槽，二者不同点可以说明外墙兴建时的所考虑的坚固程度要远远大于内城。目前外郭墙基长度已达8000余米，而内城总长度不足7000米。外郭城墙的走向是围绕内城依照地势而设计，防御的性质十分明显，内城内部保护均为宫殿遗址，规划的比较规整。二者的关系应该是唇齿相依，相辅相成的。

近年来的考古资料表明内城内的宫殿基址不仅仅分布在东北部，此外在商城路、东西大街、红旗大楼、河南省电力技校都发现有夯土基址，这表明内城内主要为宫殿区。除宫殿基址外城内还发现有宫城墙、大型壕沟、规模宏大的蓄水池、排水沟、大型夯土水井等。从这些夯土基址的规模以及宏大的蓄水池等设施我们可知内城是当时统治阶级生活的主要场所。

外郭城内则不同，主要为手工业作坊和墓地、祭祀坑等。内城与城外的商代文化层紧密相连，表明它们为一个整体。但二者的保护对象不同，所以功用也不一样。

洹北商城一号宫殿基址初步研究

杜金鹏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一、建筑布局与结构

该建筑基址的平面布局为回字形“四合院式”，即主殿坐北朝南，对面是廊庑，门塾大致在南庑中部，主殿的东西两侧各有附属建筑，这些建筑单体围成一个四面闭合的建筑单元，构成一个院落。

1•主殿：主殿夯土台基平面为东西向长方形，南北宽 14.4 米，东西长不少于 90 米。主殿建筑为平均分隔的排房式建筑物，目前已经揭露出 9 间，推算总共应有 11 间。这些一字排开的房间，应该叫做“室”。在主殿夯土台基的南北两侧，均发现有夯土台阶，在商代可能叫做“阜”。

2•耳庑：在主殿的东、西两侧，联接着耳庑。由墙、柱情况分析，耳庑的房顶应是单檐、两面坡结构。庑内未发现隔墙遗迹，可能是联通的长廊。

3•西厢建筑：西厢建筑基址夯土台基东西宽 13.6 米，南北长 85.6 米。与主殿和廊庑基址明显不同的是，西厢基址上没有发现柱洞。但是有夯土墙的基槽遗迹。在西厢建筑基址的内侧（东侧），发现 3 个台阶，宽度为 2—2.3 米左右，长约 3 米。这样一个规模庞大的夯土建筑，却没有房顶，究竟是什么性质的建筑物呢？推测应与储存物资的所谓“廩台”有关。

4•南庑：在与主殿南北对应的地方是南庑，其夯土台基南北宽约 6 米。台基的南部一线有排列整齐的长方形柱坑，显然是木骨墙遗迹；在台基的北部有一排檐柱柱洞。根据防卫功能要求，结合南庑木骨墙与门塾木骨墙联通等现象分析，南庑房顶很可能属于单檐、一面坡式。

5•南门和门塾：正门位于南庑中部，由 2 条门道和 3 个门塾组成。门塾的房顶结构，可能是中间起脊、两面坡式。纵贯门塾有 2 条门道。甲骨文有“庭门塾”，所谓“庭门”当指庭之出入口，亦即“南门”。“塾”则是门两侧的建筑物。

6•庭：主殿、东西厢建筑、南庑、门塾等建筑物围成的空间，为一广阔的庭院，南北宽 68 米、东西长 140 余米。根据商周时期习惯，可称之为“庭”。

7•祭祀坑：目前在洹北商城一号宫殿基址发现的祭祀遗迹达 40 余处。这些祭祀遗迹主要分布在主殿、门塾、西厢基址。甲骨文中有祭祀“雍示”的记载，雍示即主管房舍安全之神。前述 1、3 号室中央发现的狗坑，可能就是祭祀“雍示”的遗存。门塾附近的祭祀坑已发现有 20 多座，甲骨文记载商代有门神，即“门示”，因此要对其进行祭祀。

二、建筑年代

一号宫殿为一次建成，没有发现后期增建、重建现象。大体属于商代中期建筑，即早于以安阳小屯村东北地夯土建筑群为代表的殷墟宫殿建筑群，晚于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

(下转 34 页)

属于十二台营子阶段的三个东北地区 铜剑文化之间的交流关系和样态

吴江原

(韩国 翰林大学)

本稿要探讨以朝阳十二台营 M1—M3 为标准的属于十二台营子阶段的东北地区（河北省北部地区、内蒙古东南部地区、辽西地区）三个铜剑文化（有柄式铜剑文化、釜柄式铜剑文化、琵琶形铜剑文化）之间的交流文化和样态及交流系统。

为此，先要搞清楚河北省北部地区、内蒙古东南部地区、辽西地区的青铜器遗迹之中，属于十二台营子 M1—M3 阶段的遗迹的范畴。通过该地区之间遗物组合的差异，再研讨它们之间形成这不同的类型的铜剑文化。

如此的作业之后，并进行研讨关于从铜剑文化发现的多种遗物要素，此后再要考察十二台营子阶段的三个文化之间的关系如何。

关于交流关系的分析，不但可以分析交流的事实，而且可以进一步探讨交流系统和样态。

(上接 33 页)

三、建筑性质

一号宫殿基址位于宫殿区东南部，不是宫殿区中轴线上的主体建筑。由此可以排除洹北商城一号宫殿为寝殿的可能性。从规模和结构特点分析，也可排除其为寝殿、朝堂的可能性。该宫殿大小相仿的“室”都对应一座夯土台阶，显然是相互独立的，比较适合于作为庙堂供奉列祖列宗的神位。因此笔者倾向于在朝堂建筑与宗庙建筑两种可能性中，选择后者。

四、学术意义

第一，洹北商城一号宫殿基址的发掘，为商代中期都城遗址“洹北商城”的确认，一锤定音。第二，洹北商城一号宫殿基址的发掘，必将有力地推动洹北商城考古工作。第三，洹北商城一号宫殿基址的发掘，填补了中国考古学上中商宫殿遗址之空白。第四，洹北商城一号宫殿基址的发掘，为深入研究殷墟宫殿区建筑基址，提供了绝好的比较资料。

枣庄东江春秋墓地发掘的意义及相关问题

李光雨

(山东省枣庄市博物馆)

2002年6、7月间，枣庄市文物办和枣庄市博物馆对山东省枣庄市山亭区东江春秋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出土了一批珍贵文物，经考证，该墓群为春秋时期小邾国的贵族墓地。共发掘了三座墓葬。出土随葬品93件，其中青铜器63件（24件有铭文），陶器17件，玉器12件，骨器1件。这一考古发现，为研究小邾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小邾国的地理位置、墓葬形制、埋葬制度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新闻媒体报道后，引起国内外考古界、史学界及古文字学界的广泛关注。

一、墓葬的地理位置

东江村位于枣庄市西北约28公里的山亭区山城办事处。墓地位于东江村东南一台形高地中部，海拔约95米，当地人把此地叫做城顶。墓地北依马山，东面为绵延群山，西部为沃野平川，十字河经墓地东流向南又折西流入薛河，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十分优越。

二、发现和发掘经过

6月3日，枣庄市文物部门接到群众举报，反映东江村东南的高土台的南侧，有农民卖土时发现古代墓葬，并被盗掘。市博物馆组织专业技术人员，于6月5日—8日对这座残墓（M1）进行了清理。清理出随葬品7件，有5件青铜鬲和2件陶器，其余随葬品被盗走。出土的5件青铜鬲均有铭文，从铭文内容可知，此墓为春秋时期小邾国的贵族墓葬。随后，我们又清理了两座贵族墓。

三、墓葬形制

经发掘的三座墓呈南北走向排列，均为土坑竖穴墓，有木棺、椁，棺椁底部铺一层厚约5厘米的朱砂。

四、关于墓主人问题

发掘的三座墓葬中，均出有带铭文的青铜器，这就为我们考证墓主人提供了较为可靠的依据。但所出青铜器的铭文涉及许多国族、姓氏及婚姻制度，其错综复杂的关系有待进一步考证梳理。根据初步考证，我们有如下认识（略）

五、关于小邾国都城的地理位置问题（略）

齐长城源头建置考

任相宏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

一 前言

齐长城，东周时期齐国最为艰巨的军事工程，遗留至今也是山东境内规模最为宏伟的建筑遗迹，所以一直受到人们尤其是齐鲁学人的关注。其最西端的防门，因修建年代最早而被称为齐长城源头。齐长城源头的北侧就是长清仙人台周代郭国贵族墓地和双乳山西汉济北王陵，三者呈三角形分布，并且其间还存在着或多或少的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为了清楚仙人台周代郭国贵族墓地和双乳山西汉济北王陵的有关问题，笔者对齐长城源头产生了更为浓厚的兴趣，并进行了一番实地考察和研究。结果发现，尚有很多可商榷之处，甚至于位置环境、沿革隶属等问题也需纠正。

二 自然环境

经实地勘察，齐长城源头就位于现在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区（2002年5月撤县设区）孝里镇广里村以北400多米处，北距孝堂山3.5公里，距区政府驻地25公里，西距黄河4公里，即东经116度34.5分，北纬36度21.6分。

这里正好处在泰山西侧向西延伸主体山脉的西端，也就是泰沂山脉的最西端，再西就是黄河（济水）、鲁西平原。泰沂山脉、济水，自古就是自然屏障，东西向的泰沂山脉、南北向的济水在这里构成了一个“丁”字形屏障结构。沿黄河东岸，即泰沂山脉的西侧有一条狭窄的南北向山前地带，这一地带自古就是中原与海岱地区之间的交通要道。齐长城源头就在这一要道的“丁”形屏障结构上，而且其西还据有涓湖，形势险要，是一咽喉之地，军事要塞。齐长城源头之所以选点此地，当与这一特殊环境相关。

由于特殊的环境，这里政区沿革多变，就晚近而言，曾隶属过肥城、平阴，现在虽然归长清所辖，但也是处四市（济南、泰安、德州、聊城）五县（长清、肥城、平阴、齐河、东阿）六乡镇（孝里、双泉、安城、栾湾、大李、马集）的交界之处。

三 相关遗存

既然齐长城源头是一军事要塞，那么这里就遗留有与之相关的遗存。目前在这里发现的重要遗存有齐长城城墙和大街制陶手工业作坊。

现存城墙位于广里村村北220国道以西的平地上，是一条孤立的東西向墙体，东西长160米，高2米，底宽30米，顶宽27米。城墙以西，即是孝里洼，孝里洼地面低于城墙地面近3米；城墙向东，地势拔起，遗迹及其行踪尚能隐约可辨。

大街制陶手工业作坊遗址，位于齐长城源头夯土城墙西北1000米处的大街村村西。遗址是土地承包人在此挖掘鱼塘时发现的，笔者曾多次到现场作过考察。观察到的遗迹种类较少，能够确定的都是陶窑，有10余座。这些陶窑都分布在鱼塘的底部及其四周，地面不见。从暴露的情况看，

遗址面积至少有 10 万平方米，规模很大。陶窑距离地表较深，其上都覆盖着一层 1（东部）至 2.5（西部）米厚的黄河淤积。陶窑破坏严重，保存不好。从残存的情况看，陶窑都凿建在当时的原始生土层中，均为土窑，形制、结构一致，都是圆形筒状竖穴式的所谓“馒头窑”，由窑室、窑算、火膛、火门等几部分构成。窑室直径在 1.3 至 3 米之间，通高 2 米左右。由于没有发掘，窑算、火膛、火门等具体情况尚不清晰。部分窑室内残留有半成品陶器，地表也暴露有很多陶片等遗物。陶器器形有鬲、甗、釜、豆、盆、盒、壶、罐、瓮、筒瓦、板瓦、垫托、拍子、范模等，为日常生活器皿、建筑材料和制陶工具。另外，还有少量的石范等铸器范件。

从遗存的年代特征看，夯土城墙的年代为春秋晚期偏晚阶段，大街制陶手工业作坊的年代从春秋晚期偏晚阶段开始一直延续到西汉。

四 地理考证

东周时期，在齐长城源头曾发生过许多次战争，产生过重大影响，其中最重的是鲁襄公十八年晋伐齐之役，《左传》对其有详细记载。这一记载不仅记述了这场战争暴发的缘由和过程，而且还提到了齐长城源头的平阴、防门，同时还涉及到了齐长城源头附近的京兹、郛、卢等重邑。

通过考证我们认为，防门是齐长城源头的主体建筑，其东与长城相接，西凭涓湖、济水，后人所谓的防头。广里在当时非地名，是指齐侯防晋堑濠之规模，作为地名或是村名，是后来之事，源于鲁襄公十八年晋伐齐之役。作为一个军事防御体系，齐长城源头主要由防门和平阴组成，前者是前沿阵地，后者是保障之地，而大街手工业作坊则是两地建筑材料的供给地。平阴在孝堂山西南，即大街制陶手工业作坊的东北，防门在大街制陶手工业作坊的西南，即今孝里洼（涓湖）内。郛，即长清仙人台一带；卢，即长清卢城洼；京兹，待考。

五 年代推断

齐长城源头建筑年代，有历史说和现在说之别。历史说有齐桓公时、齐威王时、齐宣王时等之说，现在则有下限公元前 555 年、春秋中叶、春秋中叶以前说等等。历史说只是在某些文献中偶有记载而已，现在说则是从各个方面如历史的、考古的广征博引加以推论。现在之说间虽有区别，但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下限不会晚于鲁襄公十八年，即公元前 555 年。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他们都把《鬲羌编钟》视为铁证，并把它所记之战与《左传》襄公十八年晋伐齐之役进行对解，并采纳了众多《鬲羌编钟》研究者中一家之言，甚至是一家之言的早期之说。

其实，《鬲羌编钟》的年代是很有争议的，其所记之战也并非鲁襄公十八年晋伐齐之役。我们通过对《鬲羌编钟》的再审视，结合某些文献，并综合齐长城遗存及仙人台周代郛国贵族墓的年代认为，齐长城源头建置年代上限不超过鲁襄公十三年（前 560 年），下限不晚于周威烈王二十二年（公元前 404 年）。此地作为设防要地，先是在防外堑濠，尔后筑城。堑濠在鲁襄公十八年（前 555 年），筑城始于春秋晚期偏晚阶段，使用于战国时期，田齐为其顶盛时期。

六 结语

就自然环境来看，齐长城源头地势险要，自身就是一个天然的要塞，但作为一个重要的军事防御体系而言，这自然是不够的，还需要些配套设施，如城墙、城门及驻扎的兵营等。从遗存和文献来看，齐长城源头至少包含了防门、城墙、平阴、手工业作坊等几部分，而且所有证据都表明，就目前所见的这些设施最早始建于春秋晚期偏晚阶段。

中原、南方所见匈奴文化的影响

乔梁

(中国文物研究所)

按照文献的记载，匈奴大约在战国晚期出现在阴山南麓以内蒙古中部为核心的区域，当时地处北方的秦、赵、燕都曾和匈奴产生过争端或联系，在西沟畔匈奴墓葬中出土的动物纹金饰牌等器具上就有战国秦或赵国文字的刻铭，反映了匈奴与中原的联系。而在燕下都发现的辛庄头 30 号墓中与中原系统的陶礼器等共出了一批具有浓厚匈奴文化色彩的金银器等物品，表明了当时两地的关系，这也是比较明确的早期传入中原的匈奴文化因素，时代大约在战国末期。

随着秦的统一，和匈奴联系较多的秦人也将匈奴文化的因素传到各地。临淄商王村一号墓所见的北方文化因素可能就是由东进的秦人所带来的。即使进入汉代，由秦人所携带或引入的匈奴因素仍有较多的发现，如在长江流域所见当多同秦人的活动有关。

秦汉之际，利用中原纷争的形势匈奴大大扩充了势力，并不断威胁着中原，迫使汉王朝只能采取“和亲”等羁縻的策略以求安定。各地这一时期的考古发现充分反映了汉匈两地的交往与联系，比较明确的匈奴遗物在全国广大区域都有发现。

匈奴因素在中原或南方的出现存在着不同的方式，其中在一些高等级墓葬中的匈奴物品有可能是来自官方间的馈赠或贡献，而等级略低一些的遗存中所见者，则有可能是民间贸易或边事征战等活动的产物。此外在长安附近发现的墓中出土了透雕带扣等匈奴文化遗物而缺乏中原因素的遗物，故有研究者认为系匈奴人的墓葬，如果这一结论可以成立，则这也是已知在中原地区发现的明确属于匈奴的墓葬。

从发现看，中原及南方地区接纳的主要是匈奴上层社会使用的金银器具，其中主要是服饰的带具和马具等，此外匈奴所崇尚的一些动物题材图案也被移植到内地的器具上。同时通过匈奴的中介，一些来自中、西亚或者欧洲的物品也出现在内地。

海岱地区出土的砚台

吉田惠二

(〔日〕国学院大学)

砚是战国末期出现的中国文具，但在海岱地区始见于汉代。汉代砚共有四类：即卵石砚、圆形板石砚、有盖三足圆形砚和长方形板石砚。但在海岱地区，目前只出土有圆形板石砚、有盖三足圆形砚与长方形板石砚三种形态。长方形板石砚还见于魏晋南北朝时代，海岱地区的苍山县元嘉元年（424年）就出土过这种砚。石砚流行于汉代，三国时代以后剧减，同时灰陶砚或瓷砚，如三足圆形砚与带有四根以上足的多足圆形砚等开始盛行。这些三足或多足的陶砚，在海岱地区也应该使用，但没有正式报告报导。到隋唐时，这些陶砚还一直沿用，并出现兽足圆形砚、蹄足圆形砚、圈足圆形砚、风字砚和龟形砚。在海岱地区也发现过多足圆形砚、蹄足圆形砚和龟形砚。自五代至宋代，部分风字砚演变为长方形砚与抄手砚，可在海岱地区只发现过长方形砚。虽然唐代的兽足圆形砚、圈足圆形砚，以及五代到宋代的风字砚与抄手砚都没发现过，但这些陶砚在海岱地区也应该存在过。

圆形砚的发展过程 自战国末期至西汉早期，卵石砚没有砚盒。后来出现的圆形板石砚，较早的型式还不见砚盒，但较晚的石砚多嵌在圆形的木板或者漆板上，还带有三个铜足与盖子。有盖三足圆形石砚是这种砚的仿制，同时这种圆形砚又是陶质有盖三足圆形砚的模型。三国时代陶质三足圆形砚始出现，隋唐时期演变为蹄足圆形砚。

长方形板石砚的三种形态 长方形板石砚，根据横剖面的形制与制法，可分三类。I类：剖面呈长方形，整个器表被磨得平滑。II类：剖面为倒梯形，整体器表被磨得平滑。III类：剖面为倒梯形，只磨平平面。通过这样的演变规律可知，长方形板石砚发展得愈来愈有利于嵌入木制或漆制砚盒内。

韩国的风纳土城及百济王京遗迹发现和中国古代城郭

李亨求

([韩] 鲜文大学历史学系)

笔者早已认识到汉江流域百济前期首都遗迹之一的风纳土城的重要性，因此从台湾大学游学回国以后，对风纳土城现场实地勘探和调查，多角度地提议保存和对策问题。

1983年7月6日由笔者组织召开了“保存汉江流域百济前期首都遗迹的问题”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当时考察了江南地区百济古坟和风纳土城的现状，并向学界和有关部门的建议事项中指出，史迹第11号的风纳土城，现在复原保存着大路边约500m的北边和东北边，洞内约1.5km的东边仍处于湮灭的危机，因此要研究对其进行保护和复原的策略。

汉城风纳土城，位于汉城特别市松坡区，西临汉江，略呈南北向，平面近圆形，除西墙外其余墙垣均有残留，推定周长为3470米。1997年1月1日笔者发现风纳土城内王京遗迹，从此以后开始城墙及城内发掘，据对东墙的发掘得知，城墙断面呈梯形，基部宽43米~30米，高10米，其建造方法是先用泥铺，其上筑梯形中心土垒，土垒下部宽7米，高5米左右，然后在中心土垒内侧依次筑砂土、泥质夯土和淤泥土构成的版筑土垒，最外侧的土垒上再铺以卵石和石块。

城内发现有壕沟环绕的大形建筑基址、初期百济的居住地以及大量百济时期的遗迹和遗物，尤其是百济初期的瓦当更是引人注目。据发掘者称：城墙出土木炭及木头标本的碳十四年代为公元前2世纪~公元前4世纪，城内发现年代为公元前后的环壕遗迹，而环壕可能是在垒筑土城时被废弃。据此分析，该城的始建年代有可能早到公元前后。如果今后的发掘可以证明这种推断并且能够确认百济初期的宫殿建筑基址，那么该城不仅是目前半岛南部最早的土城，并且有可能是百济初期的都城所在。最近数年的发掘可以证明这一推断，并确认百济早期的宫殿建筑有可能是早期的都城文献所记载的河南慰礼城所在。

风纳土城位于河流近平地，在临水的台地上用土筑城垣及城垣建造技术的原始性显示出，风纳土城的城市营建理念及筑城技术，与中国西汉代夯筑城垣技术和传统显然存在着某种文化上的联系。最近，由韩神大学博物馆组主管的挖掘联立住宅敷地时，发现了宫殿遗迹，在宫阙地基的殿奠祭祀坑里发现了马头骨，并发现了‘大夫’铭的土器。大夫从中国古代官制来看，是宫中最高位官职名。可见，风纳土城为百济前期王城的主张是非常可靠的。

国立文化财研究所挖掘结果，确认了纪元3世纪前的19座百济初期城址。很多的百济前期遗迹(城址等)和遗物发现在地表下4米地点，证明记载于《三国史记》百济本纪初期记录的温祚王定都在今日的风纳土城的河南慰礼城是历史的事实。

2003 年小清河上游南部区域系统调查新收获

钱益汇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

一、调查区域、目的和方法

济南地处鲁中南低山丘陵与鲁北平原的冲击带，地势南高北低，南部为低山丘陵带，中部为山前平原带，北部为临黄平原带，地势自西向东逐渐下降，南依泰山，北跨黄河，境内河流纵横，主要分属黄河、小清河两大水系。

该地区古代文化遗址的分布状况，此前已经有文物部门作过相关的调查或试掘，发现了一批年代序列较为完整、规模较大的遗址，并有相应的报告发表。为系统了解济南东部小清河流域上游南部到山前平原带古文化遗址的分布状况及其聚落形态演变特征，进而了解当时人类活动与环境的关系、人类生存方式的演变，考察大辛庄遗址在周围遗址群中的地位 and 作用，进而推动中国文明起源模式的研究和社会复杂化进程的探索。2003 年 3 月，山东大学考古学系结合部分研究生和 2000 级本科生的实习，我们选择了济南东郊小清河流域以南，南到南部山区五顶茂陵山和马山坡以北地带进行了拉网式区域系统调查，面积约 90 余平方公里。

本次调查采取的是区域系统调查法 (Systematic Regional Survey)，调查小组由 5-6 人组成，人均间距约 30-50 米，中间一人为领队，持有比例尺为 1:10000 的地形图。为对遗址进行更加精确的年代断定，我们尽可能地采集地表遗物，有时也利用断崖、沟坎等所暴露的文化堆积来了解遗址的有关信息，然后及时地将其采集地点落在地形图上。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对遗物进行分期断代，分野外和室内分析两个阶段。最后我们根据所分析的结果制成各个时期的聚落分布图，并以此为基础来探讨该区域的聚落演变规律和早期文明发展进程。

二、遗址概况

经过野外调查和后期室内分析，我们共发现汉代以前遗址 145 处 (33 处为两种以上文化堆积，110 处为单一文化堆积)，其中后李文化遗址 2 处，龙山文化遗址 7 处，岳石文化遗址 4 处，商代遗址 11 处，周代遗址 42 处，战国汉代遗址 119 处。

后李文化遗址共 2 处，均位于山前平原的沟渠边和台地上，面积都较小。文化层中包含石斧和一些陶片，均为夹砂红褐色，陶质疏松，极易破碎。因北部窑厂取土，该遗址已遭完全破坏，仅余下宽约 50 余厘米的断崖。我们采集到陶釜、陶饼、平底器等器形。后李遗址的发现有利于我们在更大程度上认识后李文化的分布范围和文化内涵。

龙山文化遗址共 6 处，位于海拔 50~30 米之间，仍为山前平原地带。遗址的面积较前扩大，数量增加。代表性遗址主要有大辛庄遗址、徐家庄遗址、裴家营遗址。采集的龙山文化标本主要有鼎口沿、器盖、鼎足、鬲把手等。

岳石文化遗址共发现 3 处，明显少于龙山时期。遗址开始出现于低海拔地域。代表性遗址是大辛庄遗址，遗存也较为丰富。采集标本主要有盆、甗足、豆盘、罐等。

商代遗址共发现 11 处，数量有所增加，开始出现几个面积较大的遗址。在海拔较低约 20 余米的地区遗址较前数量增加，面积增大，遗存更加丰富。这一时期遗址也开始向海拔较高地区迁徙。这些现象反映了人口的增加和人们改造自然、生存能力的增强。聚落间等级分化严重，大辛庄遗址是该地区的绝对中心。采集的标本主要有陶鬶、甗、鬲、盆、罐、簋、豆盘等。

周代遗址共有 42 处，数量、面积都大量增加。因人口的增加和人们生存方式的改变，人们继续在地势较高或较低地区居住或迁徙。开始形成少量的聚落群，如徐家庄西南遗址、裴家营西南遗址。值得注意的是，该时期多个地区中心的兴起，冲淡了大辛庄遗址绝对中心的地位。采集标本主要有豆、盆、罐、瓮、鬲、孟、釜、壶、钵、甗等。

新发现的战国汉代遗址共计 119 处。遗址数量和面积急剧增加，遗址的密度也大大增强。在海拔 30~60 米之间，遗址密集，遗址数量极大丰富，几乎可以连成一大片遗址群，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当与该地区适宜人们居住和人口的急剧增长有关。人们为了生存不断开拓新的生存空间，新出现了几个较大的遗址。遗物十分丰富，地表分布密集，主要有罐、瓮、孟、豆以及建筑材料筒瓦和板瓦等。各遗址大小差异缩小，单个遗址面积变大，地区中心不突显。

三、调查意义

区域系统调查法是开展聚落考古学的前提，近年来开展的一系列调查工作日益显示，该方法在研究社会组织结构的变化、社会分层、政治组织的变化等社会复杂化进程问题上有着重要的价值。

本年度小清河上游南部地区的系统调查完整地揭示出该地区不同时期聚落的不同发展模式。我们认为，各个时期聚落的分布状况、数量和面积的变化以及等级的改变是与当时的环境密切相关的，同时它也是不同时期政治权力的交替和政治中心转移的反映，这些变量能反映不同时期的人口状况和生存能力。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大辛庄遗址的地位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变化过程，其地区中心作用在不同时期大小不同，反映着不同时期的社会发展模式和不同的政治景观，也为我们研究不同时期聚落间的联系提供了基本资料，也必然带动相关课题的研究。

山东济南市腊山汉墓发掘简报

济南市考古研究所

2001年夏，济南市考古研究所抢救性发掘了腊山汉墓（定为腊山M1）。该墓位于市中区腊山产业科技园内，腊山东面的山坡上。墓葬周围此前未发现过其它古代墓葬。

一、墓葬的形制

整个墓葬平面为折尺形，由墓道和墓室组成。墓道为南北向，方向83度，墓室东西向，墓道与墓室构成一个83度的拐角。墓道为斜坡形，斜度为18度。底部经过夯打，墓壁除部分坍塌外，基本垂直。东西宽6米，南北长残存11米。现存墓室开口东西长27.5米，南北宽7.4-8.4米，四壁皆内收，上宽下窄。底部长25.5米，宽4.8-6米。墓室底部略有缓坡，东低西高，西距现开口4米，东部距现开口4.75米。

墓室形制较特殊，根据发掘情况大致分为前庭、前室、后室三部分。前庭南部与墓道相连，前庭东部与前室相连，前室东部与后室相连。三部分在宽度的变化上相差不大。

前庭底部总长7.9米，与墓道相似也为斜坡状，但坡度较缓，应该是墓道的延伸。前庭中央堆有一堆碎石，可能是修墓所剩的石料。

前庭与前室之间有一道碎石堆积的石墙。石墙高1米，厚约1米，不规则石块堆成。前室底部总长9米，自下至上可分三大层，最下边的一层为4.5米长的斜坡形甬道，与前庭相连，坡度与前庭一致，在甬道的后4.5米处变成平底；然后是第二层，在平底的地方南北各放置一个木椁箱，把前室分为南北两部分。其中南椁箱内放置了鼎罐壶等35件陶器，部分陶器内还发现有鱼、鸡等大量的动物骨头。北椁箱内无随葬品。南椁箱的西侧还有一边箱，亦不见陪葬品。在三个椁箱周围用碎石填充，其中南北椁箱间的碎石上还放置了两只头向相对的成年狗。前室上铺三层席，第三层是在距墓底1.5米高的地方用直径为0.25米左右的横木搭成顶棚，横木的两端搭在紧靠南北壁用石头堆起的二层台上。横木的上方铺席子，然后再填土夯打。

前室通过一封门石墙与后室相连。石墙高1.1米，厚约1米，不规则石块堆成。后室底部长6.6米，宽4.8米。与前室形制相似，自下而上分为三大层：第一层为先铺一层碎石，其上覆以红土，红土上再铺一层碎石，加工成一个比前室底部高出0.3米的一个大“棺床”；第二层即中间层，棺床之上放置棺椁，随葬品分置四周。椁的痕迹长5.2米，宽3米，椁上涂红漆。棺椁层数已无法细分，也未见成型的骨架。棺椁四周及顶部都填充石块，然后在上部盖上最少三层席子；最后一层是顶层。在距墓底2.3米高的地方用直径为0.25米的横木搭成横梁，横梁的两端搭在南北壁上突出的0.5米宽的生土二层台上。横梁之上铺上席子形成顶棚，最后填土夯筑。在正对着墓底4米高处的中央，有石头堆积成的一个方形台，边长2米，高0.3米。在它四周断断续续的发现几层席子，且在它南部1.5米处，还发现一只幼狗的骨架。联系二者，可能是修墓过程中进行了祭祀活动。在后室有两个盗洞，其中一个为早期盗洞，垂直地打在前后室之间的石墙上，垂直穿过石墙直达墓室。另一个盗洞从南壁边上斜着打到后室中间，盗洞里面发现一个宋代白瓷盆。

前室和后室的顶棚不在一个水平面上，后室的顶比前室高出 0.8 米，前后室相交的高差处用 2 根圆木横梁封挡，南北两壁上尚存柱穴。顶棚搭好后，再在其上覆盖多层席子，填土夯实。墓内填土呈灰色，与当地的红土形成明显的对比，而且含有大量商周时期的陶片，显然是从异处搬运而来。土质非常坚硬，分层夯打，夯层厚 30—40 厘米不等，夯窝直径 6 厘米左右。有的地方因顶棚棺椁腐朽而出现的下折现象。在填土的不同层位中还发现有多层席纹痕迹和铁马衔、铜节约、铁夯杵以及零散马骨等遗物。

二、遗物

腊山汉墓共出土铜、铁、水晶、玛瑙、陶、漆器等各类文物 70 余件。

陶器共 47 件，器形有壶、鼎、罐、瓮、盆、钵等。除一件泥质红陶钵和二件泥质灰褐陶盆外，其余均为泥质灰陶。鼎壶等带有彩绘，但保存不好，大部分脱落。其中小壶 18 件。形制大体相同。弧形盖，敞口，方唇，细颈，鼓腹，圈足，腹颈最大处在中部偏下。腹部有不规则的戳印纹。在器盖、颈部、腹部各饰一圈彩绘，纹饰简单，多为白地黑彩三角纹，由于保存不好，大部分已脱落。

鼎 7 件。大小其本相似，弧形盖，子母口，深腹，圜底，腹耳带镂孔，耳上端向外倾斜。器身腹部、器盖带各饰一圈彩绘，纹饰简单为三角纹，保存不好，多已脱落。

罐 10 件。大小相差不大。弧形盖。

瓮 2 件。直口、鼓腹、圜底，肩部有一道凹弦纹，腹部饰稀疏的绳纹。可分两型。

盆 2 件。泥质灰褐陶，大小形制相似。敞口，叠唇，下唇稍卷，腹壁斜直，圜底。口以下底以上饰瓦纹，底部饰交错绳纹。

钵 1 件。泥质红陶，园唇圜底，底部饰方格戳印纹。

铜器出土 28 件。器形有权、瑟轸、支脚、狗项饰、节约、车仪、扳手、小钩等。

瑟轸 5 件。大小相同，应为同一乐器上的器物。

铜权 3 件一组。上面有铭文分别为“一斤”、“四两”、“一两”。现称得实际重量分别是 232、54.1、12.5 克。

漆器支脚 3 件。底座成半圆形，厚 0.6 厘米左右，正面为熊的形象，形象不尽一样。

狗项饰 两组。每组一个铜环，4-5 个齿贝。

另外还有节约、车车义等器形。

钱币 13 枚，皆半两钱，圆形方孔，直径 2.38-2.46 厘米不等，2.4 厘米居多，无郭，穿径 0.75-0.9 厘米不等，0.8 厘米居多，正面铸篆文“半两”二字。重 2.5-3.0 克不等，2.4 克居多。

铁器 2 件，均为封土中出土。一件为夯杵，圆桶形，口略大，壁斜直，平底。另一件为马衔。

封泥 1 块。方形，封泥印文为“夫人私府”。长宽各 2.5、厚 0.6 厘米。

玉龙 1 件，用途不知，上饰谷纹。长 4.2、厚 0.3 厘米。

印章 2 件，分别为水晶和玛瑙质地。水晶印整体透明，正方形，覆斗纽，鸟虫书体阴文，印文为“傅女 𠄎”。印面边长 2.4、高 1.7 厘米。玛瑙印正方形，覆斗纽，上端正中有一个穿孔，篆体阴文，印文为“妾女 𠄎”。印面边长 1.9、高 1.4 厘米。

（执笔：郭俊峰）

长清大觉寺东汉砖室墓发掘情况

济南市考古研究所

2003年4月，济南市长清区归德镇大觉寺村民在村西约2公里处推沙时，发现一座汉代墓葬，济南市考古所和长清区文管所随即进行了为期80天的抢救性发掘，共获得陶器、铜器及铁、玉石文物110多件。

据了解70年代此墓的上方有高约7米的封土堆，上面还有寺庙，现在地面上还可以采集到瓦当和建筑构件。其上发现一件残碑，上有《重修大觉寺三教堂碑记》，落款纪年为康熙二十九年。

墓葬形制：

墓葬刚发现时上方还残留有1米的封土，从发掘后的剖面来看，越接近墓室的地方夯层加工越好。从墓室墙体外侧的土层和其中的石灰面来看，此墓的建筑方法应该是先在要建墓的范围凿出一个缓坡的大坑，再建筑墓室，所以留下了使用面的痕迹，这个范围不包括墓道。用砖建好墓室后，再在前后室周围用大石块先砌直墙，然后在一定高度上向内收，上面的封土应该都是后来堆上去的。封土在墓室的周围上没有加工太甚，墓室以上部分进行了仔细夯打，夯层大约是10-20厘米，夯窝明显，直径约4厘米，深浅不一。墓道里也是20-30公分一层分层夯打。而且，从采集和出土的瓦当来看，封土堆上已经有了汉代的建筑。

该墓为大型砖石墓葬，平面近似“中”字形，东西对称，方向190度。南北总长47米，东西最宽14米，由南向北分别为墓道、甬道、东西耳室、前后室，周围堆有石块。

墓道位于墓室南边正中，长25米，斜坡状，底面稍微加工，东西两斜壁上有竖槽，宽约40厘米，深约8~12厘米，长度1~4米，长短相间。两壁的上部是封土，下部是生土，而且都有工具加工的痕迹，所以我们推测墓道是在封土中挖掘而成。这就是说墓葬修好的时候，并没有墓道，墓道似乎是为了下葬又一次修筑。墓道填土都是厚度在10-30厘米的夯层，其中还发现有零星的彩陶碎片。

墓门两侧、上下都是石板，厚约20厘米，无花纹，加工的非常光滑。上面的山墙是两顺一丁的砌法。墓门南侧由外向内有石块和砖两层封门，石块是不规则的，和山墙高度一致，南北宽度2米，而砖墙略低，使用一层砖平垒起来。

甬道底部南北5.1米，东西2.8米，东西直墙上起券，都是两顺一丁的做法，直墙高1.9米，券顶距地面4.4米，双层券砖都是楔形砖。地面错缝平铺两层地砖。甬道东北角发现有完整骨架一具和两段下肢骨，尚残留有玉衣碎片和大量陶器。

东西耳室形制基本相同，东西2.8，南北2.75米，券顶内侧距地面2.5米，在1.6米直墙上起券。东耳室内仅有陶器一件，券顶中部有铁钩两件。西耳室内不见遗物。

前室为东西横列的券顶结构，南北3.6米，东西9.3米，东西山墙内侧双层起券，山墙和南北直墙都是两顺一丁的砌法，地面是四层，上面错缝平铺1层，下面是立铺3层。双层起券，不同部位券砖大小不一致，都是楔形砖，两侧和上下都是厚约20厘米的石板筑就，在砖墙中平砌石

板中间立石板作门框，上置5块石板做门楣。最外侧的石板均无花纹。

后室东西3.3米，南北4米，北山墙和东西直墙都是两顺一丁的砌法，山墙高5.4，直墙高2.6，券高2.6米，券砖大小和前室相同，地面也是错缝平铺。石门下有两层石板，门两侧也是宽米左右的石块叠起，中间立石板做门框，其上又并列立板做门楣，但是最外侧的两边均无花纹。

围绕前后室，紧贴砖墙的外侧石块堆砌，高度低于券顶。因为除了甬道和前室的石门上方，前后室的石门上方有石块落下，而前后室内不见石块，可以推知当时券顶未被覆盖。外侧石块堆砌方式也是在相当于直墙的高度上直砌石块，砖室起券时内收。前后室和甬道的连接处已然坍塌，堆砌方式不明。前室北墙西段接近地面处有厚度约20厘米的4块石头叠砌在砖墙中，不知是否有意堆放。中有一块长90厘米、宽100厘米、厚23厘米的石块上，阴线刻画水鸟叼鱼及“美石可七百”铭文。

出土器物

此墓几经盗扰，加上坍塌，器物残损严重，而且较为零乱。器物集中在甬道和前室，后室和耳室只有零星的碎片。

陶器的器型有壶、樽、盆、瓮、灯、厕、钵、扁壶、案、家禽家畜、奩、等，共计70余件，大部分都是泥制红陶，其中以瓮、盆、钵最多，都出在前室和甬道内，由于墓室坍塌，出土时都已经破碎。

壶 方唇，侈口，长粗颈，扁腹，腹部下垂较甚，腹部左右各有铺首衔环。颈部到腹部都饰有彩绘。标本M2:2，残高50.5厘米，口径28厘米，腹径39.2厘米，泥质黄褐陶，折沿，尖唇，侈口，长粗颈，正中有两道凸弦纹。口、颈、肩部各有一道宽约3厘米的白色彩绘，彩绘脱落严重。

盘 黄褐色，敞口，方唇，折沿，斜直壁，平底，底中部多有内凹。盘内残余黑色陶衣，少量饰红色。

铜器约30件，全部都是漆木器的构件，主要有盖弓帽，铜泡等。

玉石器百余件，器形有玉衣片、覆面、玉塞、滑石猪、玉璧等，表明此墓的墓主人身份比较高。出土的石制兽形砚台，上下两盒，整体阴线装饰。兽口大张，颌下有须，全身覆鳞，左右各两只翅膀，刻画出羽毛。四肢上有带圆泡的带饰，脊上前部有盛露的盘子，后面坐着四人，左右各两个，左面两人盘腿而坐，头戴小圆帽，都有胡须，其中一人面颊瘦长，鼻高目深，又戴小帽，不似汉人。右侧还有一兽，全身覆鳞。打开后上盒内空，呈方形母口，正对下盒的砚台，还有圆形的凹陷，应该是放置研磨器的。

墓主人身份

从前室的零星散骨和甬道内的骨架以及出土的6件玉握来看，墓内可能至少有3人，两人身上都玉衣。东汉的时期使用玉衣已经成为比较严格的制度，此墓墓室双层起券，而且使用了题凑石，因此从墓室规模和出土的玉衣片来看，墓主人的身份较高，所享受的应该是侯一级的待遇，

（执笔：刘剑）

济南县西巷考古发掘

济南市考古研究所

县西巷位于济南老城中部，因位于明清府衙的西侧而得名，属于济南市公布的第一批地下文物保护区。2003年4月，在县西巷拓宽改造工程中，施工人员意外发现有几个“无头石佛”，经鉴定为南北朝至宋代时期石刻。5月份发掘了一个佛教造像窖藏坑。7、8月份，济南市考古研究所对道路西侧填埋管道部分实施抢救发掘。

此次发掘，虽然只是开狭长的探方，发掘面积受到很大的限制，受地下水位高的影响也不能深挖，但收获依然很大。除了清理出一条老城区南北向的地层剖面，还发现了众多建筑物遗迹如大型房基、宋代佛教砖雕地宫和造像窖藏坑等，瓷器、陶器、佛教造像、建筑构件等。

佛教遗存比较集中的分布在县西巷南部。尽管不能够大面积揭露，但依然发现一座砖雕佛教地宫和又一座佛教造像窖藏坑，在周围地层中，出土大量佛教造像和陶瓷器等遗物。

砖雕地宫位于5月份发现的窖藏坑（补编号H58）正西方十余米。地宫内部加工规整精细而外部只是用碎砖填缝，故应是埋入地下的建筑。地宫周围没有发现塔类建筑痕迹。从地层关系看，地宫顶端部分高于当时地表。地宫的外围尺寸基本是2.2米见方，内部1.8米见方，制作精美。门道在南侧正中，出土时门口被砖封砌，所用砖料与修建地宫者相同。门外有一条向南的门道，宽度与门宽相同，在夯土中挖成，向南约50厘米，被H40打破。地宫填土中发现一件覆钵形石构件。

地宫内侧做成须弥座式，均用雕刻精美的灰砖砌成。壶门凹入壁内，辅纹砖逐层凸出，设计巧妙。须弥座上方，从西北角保留较高的叠涩部分外推测，地宫顶部应是四角叠涩顶。地宫内部装饰砖雕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辅纹，主要用在壶门上下方，上面2层，下面4层，纹样分别是连续相接的覆莲、仰莲、钱币、竹节、忍冬纹等，其中竹节纹甚为少见。另外还有组成壶门的连弧形砖上雕刻有忍冬纹。另一种是主纹，位于壶门内，单砖一侧雕成莲花、菊花、西番莲、羚羊、山羊、鹿等各种象征祥瑞的纹样。壶门之间有单个的小的立砖，三面刻有宝瓶、莲花等纹样。地宫底部铺有方砖，中部偏北嵌有一块平躺的石碑，出土时石碑呈被撬起的状态。碑铭《开元寺修杂宝经藏地宫记》，记载了北宋开元寺修这座地宫的相关情况。据碑文记载，地宫建设年代约在熙宁二年（1069年）或稍后，是专为供奉“杂宝经藏”而修建的。地宫及碑铭的记载证明，该处正是宋代开元寺遗址所在地。

地宫南侧约0.5米处发现另外一处佛教造像窖藏坑（编号H40），形状呈长方形，东西宽3.7米，南北长4.3米，深0.8米，南部正中有台阶状入口。坑的中部有一块三合土夯筑而成的方平台子，边长2.4米，制作非常规整。所有的造像都分布在台子四周，可以看出当初摆放时多“面向”中央台子。

H40出土石雕、泥塑的造像及残件60多件。造像损毁严重，多数没有头部。雕刻技法以单体

圆雕为主，次为背屏式半圆雕，在背屏式造像中有的为主尊半圆雕，胁侍菩萨是阴线刻。有些造像身上的彩绘和描金保存仍然很好，个别能看出修复过的痕迹。弥勒像占很大比重，多为倚坐，有些台座上带有发愿文，年号多属唐代武周前后。菩萨像多为单体出现，少数作为胁侍形象出现，形象也有思维、供养、胁侍等几种。佛的形象也很多，单体出现的多为结跏趺坐，也有相当数量的作为背屏式像的主体或者佛龕的主体。此外还有飞天、力士、弟子、天王、供养人等形象。造像的年代自北朝晚期到北宋，跨度很大。

在窖藏坑周围数十米的唐宋地层内我们还发现十几件佛教造像或残件，其中有些可以与两窖藏坑中的拼对，两坑中残件也可互相拼对。说明两坑埋藏时间不会相差太大，且存在非常密切的关系，同时说明这一带确系寺院遗址所在地。在地层中还发现有宋代碗底，上有墨书的“西经”、“经藏”、“西藏”等文字。

综合 5 月份的小范围发掘和 7、8 月份的发掘，总计发现石刻佛教造像 80 余尊（总体拼对后统计数字）。其年代分布以唐代为主，早期造像集中于北齐，有少量的属于东魏时期作品，另有少数几件属于北宋时期。这批造像的特点，经初步观察，与 1996 年青州龙兴寺遗址发现的造像有不少相同之处，说明青州风格的造像，向西已经影响到齐州（济南）地区。但这些造像也有许多地方与青州风格相比有不同之处，这也许反映了济南地区北朝到唐代时期佛教造像的特点。

除佛教遗迹外，县西巷考古还发现多处宋元时期的房基垫土，特别是 T24 发现的一处面阔七间、进深三间的明清时期建筑基址较为重要。该基址砖墙下面有很多排列有序的圆洞，用探铲钻探时，提上来尚未腐烂的木头，从而证明每个圆洞其实都是打入地下的木桩形成的。每根木头的直径约 10 几公分，长约 90 公分，木质很好。这种木头应是“桩基”，是以木桩代替基槽来承重墙体和整座建筑的重量，保持地基的稳定性和平衡性。另外还发现同时期的水井、窖穴、炉灶、道路、灰坑、水沟等遗迹现象，出土了大量钱币、瓷器、陶器、建筑构件、玩具等遗物。

这次发掘证明县西巷地区历史上就曾经是济南古城的中心地带，并且为我们寻找古城的城市格局变迁提供了重要研究资料。佛教遗迹遗物的发现也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类型。

（执笔：高继习）

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

第四纪环境与考古实验室简介

靳桂云

(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

成立于 2002 年的第四纪环境与考古实验室，隶属于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是山东大学重点支持的学科建设项目。

随着全球环境问题的加剧和环境与人类关系研究的不断深入，将第四纪环境与考古学研究进行有机的结合探讨环境变迁与人类发展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古代农业的起源和发展与环境变迁、人类文化发展与环境变迁的关系等课题已经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目前我国学者在上述课题的研究方面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并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但是，迄今为止在高等院校还没有系统地进行这方面的人才培养，而这将可能成为制约该学科发展的重要因素。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校领导和有关方面的支持下，成立了该实验室。

实验室现有工作人员 5 人，靳桂云教授兼任实验室主任。实验室有工作用房 90 平方米，性能先进的各种仪器设备能够满足农业考古和环境考古等方面研究工作的需要，实验室下设农业考古和环境考古两个研究组和炭化植物种子、植硅体、孢粉和炭屑分析室。

炭化植物种子鉴定是农业考古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手段，其基本原理就是用浮选的方法¹，从考古遗址的土壤中浮选炭化的植物种子，然后根据种子的形态对其种属进行鉴定、统计，确定人类利用植物的种类，特别是人类栽培的作物种类，并以此为基础，探讨古代农业和食物资源及其结构的相关问题。本实验室拥有多台浮选机，可以对各类土壤样品进行浮选，拥有的四台立体显微镜可供鉴定炭化植物种子，其中一台配有数码摄像装置，可以对炭化植物种子进行实时拍照和测量，保证鉴定结果的科学准确。赵志军博士和 Crawford 教授已经对山东日照两城镇遗址的炭化植物种子进行了系统的鉴定与研究，发现这里的龙山时代居民以稻作农业为主²。

孢粉和植硅体分析与鉴定是农业考古和环境考古研究中的两项重要手段。在农业考古研究中，孢粉和植硅体分析能够在探讨农业起源、传播路线和农业发展的历史过程等研究中发挥独特的作用，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花粉在中美洲玉米的起源与传播、植硅体在长江流域水稻起源与传播路线和水稻田研究中的应用。由于孢粉和植硅体鉴别农作物标准的建立和成功运用，使得运用孢粉和植硅体分析考古遗址中的农业遗存较单纯采用植物种子分析的方法具有明显的优势。首先，采用浮选法获得植物种子样品的前提是考古遗址要经过发掘才能有采集到可供浮选的样品，而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考古遗址都能够被发掘的；其次，就是那些正式发掘的遗址，也不是所有的时候和所有的遗迹中都能浮选到植物种子，植物种子的保存要受到土壤性质、人类活动特点等多方

¹赵志军：植物考古学的田野工作方法—浮选法，考古，2004 年第 3 期。

² 研究结果将在“考古”2004 年发表。

面因素的制约，而孢粉和植硅体特别是后者则很容易在考古遗址土壤中保存下来。基于上述，我们主张，在考古发掘的过程中，在采集浮选样品的同时，要采集供孢粉和植硅体分析的样品³，这样我们才能获得关于古代农业方面全面的信息。本实验室有两台研究型、三台学生用生物显微镜，可供孢粉和植硅体分析鉴定之用，其中研究型显微镜配有显微照相系统，可以充分满足科研与教学的需要。靳桂云博士等运用植硅体分析方法，在山东日照两城镇遗址的灰坑土壤中发现了大量的植硅体化石，并据此讨论了不同灰坑的功能和遗址周围的生态环境问题²。

在环境考古研究中，孢粉和植硅体分析是重建第四纪环境的两种重要手段，其具体思路和方法主要是第四纪地质学中古环境研究的方法³。首先要在研究的区域找到第四纪或者全新世时期的自然沉积物，在测年的基础上，对沉积物进行孢粉、植硅体分析，重建研究区气候和环境演化序列，再将该序列与古文化发展序列进行对比分析，探讨环境与人类文化的关系。靳桂云博士等运用孢粉分析方法，重建了华北北部地区中全新世环境演化过程，研究表明，在距今 5000—4000 年前后的降温事件是红山文化衰落的主要原因⁴。

炭屑鉴定是环境考古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分析考古遗址中的炭屑，能够获得人类利用植物、遗址周围植被环境等方面的信息。一般来讲，木质材料很容易腐烂，但那些没有充分燃烧的木炭则能在土壤中长期保存，考古发掘中经常能够发现这类木炭遗存⁵。炭屑分析用于考古学研究的基本原理也是用浮选的方法从考古遗址或者周围的自然沉积物中收集炭屑，然后在显微镜下根据炭屑的显微结构确定其所属植物的种属，在数据统计的基础上，分析人类利用植物的种类和方式、重建遗址周围的植被环境等。本实验室的生物显微镜和立体显微镜都可以用来进行炭屑鉴定和统计。

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实验室实行开放式管理，愿意与全国各地的相关研究机构进行多种形式的合作，从事农业考古和环境考古研究。我们可以提供以下条件：对考古发掘现场的采样提供咨询或派专人到考古发掘现场采集样品；对送来的土壤样品进行浮选和各类分析鉴定；将分析报告尽快提供给送样单位或个人。

联系人：靳桂云

地址：济南市山大南路 27 号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 250100

电话：0531—8366056、8366149

E-mail: gyjin@sdu.edu.cn

³ 靳桂云：现代自然科学技术在考古学中的应用，载：栾丰实、方辉、靳桂云编著：考古学理论、方法与技术，文物出版社，2002 年。

⁴ 靳桂云，刘东生：华北北部中全新世降温气候事件与古文化变迁，科学通报，2001 年第 46 第 20 期。

⁵ 王树芝：木炭在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江汉考古，2003 年第 1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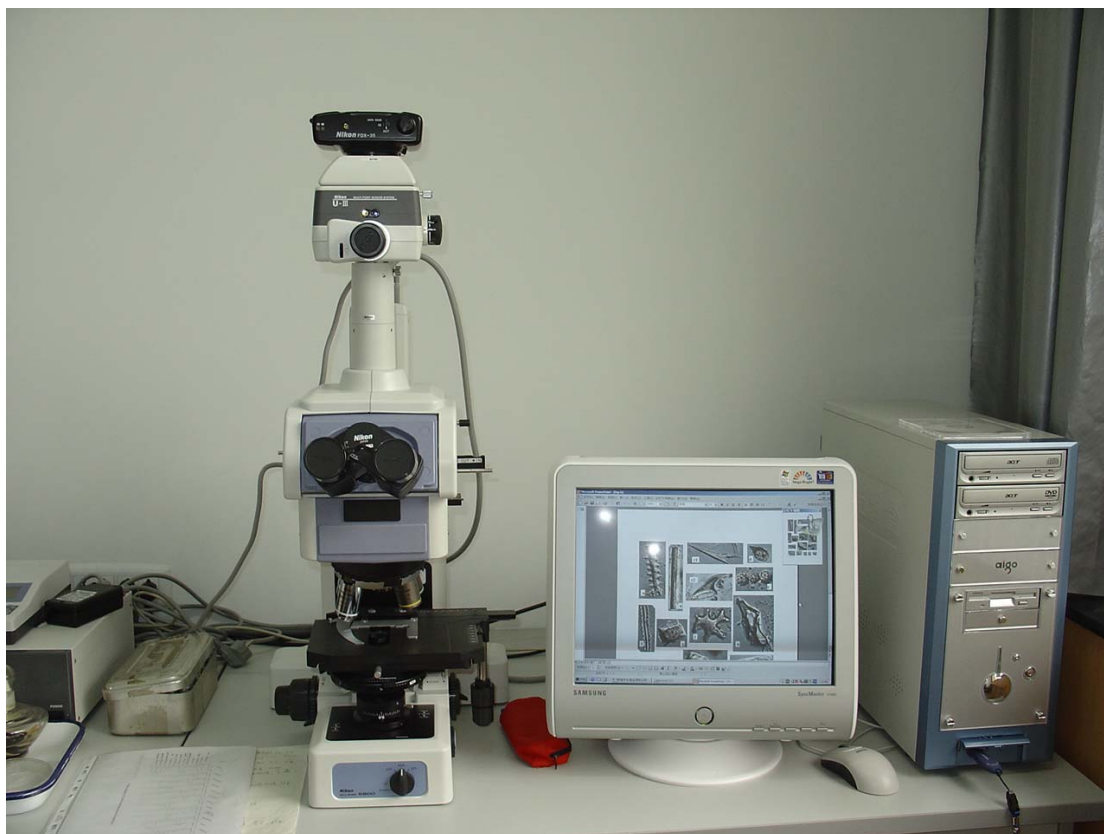
县西巷出土菩萨头像



大觉寺汉墓出土石砚



大觉寺汉墓全景



研究型生物显微镜 E800 可以随时拍摄植物化石照片



研究生在显微镜下挑选考古遗址中出土大炭屑样品

《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通讯》征稿启事

本刊为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创办的不定期刊物，旨在反映近期国内外考古研究的最新成果，主要刊载与此相关的发掘快讯、研究动态及相关论文摘要，以便为这一研究领域的学术交流提供一个新的窗口。

一、征稿内容

本刊设置中心动态、学术研究、田野简讯、读书评论四个栏目。具体内容涉及考古学的理论探索、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聚落形态演化、古环境与气候变迁、人类生业模式以及文化交流互动等方面。

二、来稿要求

1、来稿请注明作者姓名、出生年、性别、籍贯、单位、地址、邮编、电话、职称(职务)、研究方向。

2、论文、简报一般不超过3千字，书评1千字以内。请同时提交英文题目及200字左右的英文摘要。

3、来稿请附电子版，或直接用电子邮件投稿。

4、稿件一经发表，赠本刊一份以代薄酬。

三、通讯地址和咨询电话

联系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27号 山东大学考古研究中心

邮政编码：250100

电话：0531—8366149/8565268

传真：0531—8565268

电子信箱：arc@sdu.edu.cn

网址：www.arc.sdu.edu.cn

Newsletter of Oriental Archaeology Research

Volume 2, Jun. 2004

The Research center of Oriental Archaeology, Shandong University

27 Shanda Nanlu

Jinan, Shandong Province, China.

250100

Tel: 86-531—8366149/8565268

Fax: 86-531—8565268

Email: arc@sdu.edu.cn